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4年10月30日第42期（增刊）

本期目录

〔张光渝文革研究专辑〕

史林一叶

“点名”与审判

林彪说：张霖之是个好同志

话说“联动”

阅史漫笔

利用“叛徒”罪名进行政治斗争是很坏的传统

“九一三”林彪飞行目的地的逻辑推理

谁抓了杨勇？

从郑维山的起落看毛泽东的“保”与“不保”

将军在黎明前死去——赵尔陆

风云人物

文革中的张爱萍——兼谈《从战争中走来》的写作尺度

读《陈锡联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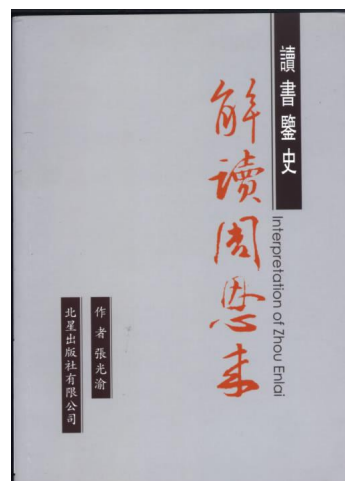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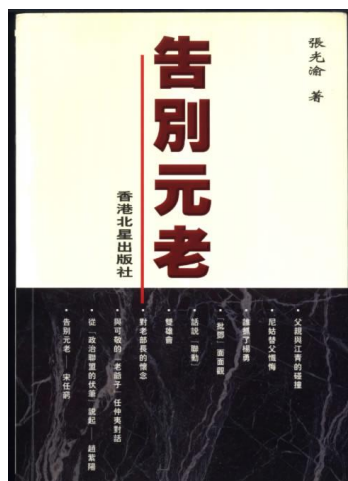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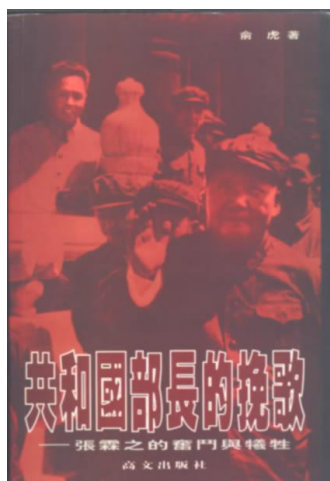
复生不易——潘复生

戚本禹的“开会即民主”论

〔张光渝文革研究专辑〕说明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公开宣称的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然而滑稽的是，他却自始至终没有提出一个怎样才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标准。不过，毛泽东倒是明确点名说过一位领导干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还是在文革爆发之前，被他点名的，就是国家煤炭部部长张霖之。

本专辑的作者张光渝，就是毛泽东钦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霖之的儿子，1950 年生于重庆，长大于北京。此后在山西插队，在山东当兵，在南京上军校，在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任职，现居深圳，已退休（右图为张光渝近照）。父亲在文革中惨死时，张光渝还未满十七岁，对父亲的工作与经历所知甚少，只是坚信父亲是好人。随着时光的推移和阅历的增加，他越来越渴望了解父辈的往事，越来越对永远失去与父亲进行“男子汉对话”的机会而痛悔万分。从 2001 年起，张光渝在家人和朋友们的热情支持下开始搜集资料，撰写父亲的传记，于 2003 年出版了《共和国部长的挽歌——张霖之的奋斗与牺牲》（作者署名俞虎，香港高文出版社）。书成之后，张光渝还有许多没有写进书中的往事史料及研究历史时的思考，于是又陆续写成了《告别元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 年）和《读书鉴史：解读周恩来》（香港北星出版有限公司，2013 年）两书，并在《纵横》、《中华儿女》、《老照片》、《领导者》等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文章。



本专辑的文章大多选自《告别元老》和《读书鉴史：解读周恩来》两书，这次发表前作者略有修订。

【史林一叶】

“点名”与审判

张光渝

按：本篇原载《告别元老》一书。

知道张霖之文革遭遇的人大都知道他的两次被点名：一次是在文革前的1965年初被毛泽东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次是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末被江青点为“彭真死党”。

我一直在猜测毛泽东点张霖之名的真实原因。我的理解，从偶然性上说，在那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对毛泽东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概念不理解，问毛泽东：

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脱口而出：

张霖之就是！

如果刘少奇问：“冶金部煤炭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会不会“脱口而出”说“吕东（时任冶金部部长）就是”？

再往前推，现有材料记载，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做的那段著名的“自我批评”讲话中，曾夹带了对煤炭部的批评：

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煤炭部的“那么一个命令”是怎么回事，毛泽东这个批评的具体背景都尚需进一步搜集材料才能加以评价。但可以断定这个间接“点名”与1965年的那一次点名性质不同。我这里说的“点名”是指1965年那一次。

其实我父亲并不是那期间第一个被毛泽东“点名”的高级干部，要说第一，只能说是第一个被正式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名号的人。196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武汉洪山宾馆接见了袴田里见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他对日本同志直言：

中央联络部长就主张“三和一少”。他本来害病，那年春季，他突然积极起

来了。此外还有统战部，一部分人主张把几个资产阶级政党在几年内改变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只是两个例子，其他还不止。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太平。每个部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也是不太平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

毛泽东在这里点了两个人的“名”——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和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再早一些，毛泽东不止一次在各种会议上当面点名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说他热衷于“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道路，后来干脆撤消了农村工作部。这三个人的被“点名”都早于我父亲，都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有关。不同的是，他们有具体的“罪名”，因此文革开始前就先后被撤职，但我父亲被“点”



的直接原因迄今不详，而且可能当时也没有人弄得清楚，所以他保住了煤炭部长的位子。早知后面发生的一切，真的还不如他在1965年就被撤了职（1964年底三届人大召开之前，我父亲曾向中央写过辞职报告，未获批准，并在1965年1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继续任命为煤炭部长。他留在家里的辞职报告底稿在文革中被抄走）。不过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的心中，在他点张霖之的名七八个月之前，就已经至少认定中央委员会里的“十几个”“修正主义者”了。这“十几个人”中，有张霖之吗？（左图为1979年张霖之追悼会上使用过的张霖之遗像。）

如果说毛泽东点张霖之名的结果没有“立竿见影”，那么点齐燕铭的名则是当即兑现的。在张霖之被点名的前一个多月，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关于三线建设的会议上插话说到文化部，认为文化系统“不在我们手里”，“整个文化部都垮了！”他对周恩来说：

齐燕铭也不好，听说他是你的秘书长？这个人不能当秘书长。你还不不如到解放军找一个头脑清醒的人。

齐燕铭抗战前是北平著名的大学教授，1937年七七事变后撤退到济南，在我父亲主办的军政人员训练班任教，后来又到我父亲领导的鲁西北根据地从事统战和宣传文化工作，并于1938年5月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1944年1月在延安赞扬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的信，就是写给剧作者齐燕铭和杨绍

萱的。毛泽东在信中说：“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当时齐燕铭是延安中央党校教务处的科长。1964年的时候，他是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兼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很受周恩来赏识。但是毛泽东明确地表态说齐燕铭“不能当秘书长”，周恩来不能不照办。不久，齐燕铭以“专职文化部的工作”为由被免去国务院的职务，又过了不久，他被贬为济南市副市长，回到了当初他参加革命的老地方。文革兴起，在济南呆了没多少日子的齐燕铭被揪回北京关押批斗。

回想往事，1964年到1965年的普通中国人，还没有像文革期间被“锻炼”得那样敏感，根本察觉不到中央内部的激烈斗争和复杂矛盾。我是到了1998年11月才从《南方周末》刊登刘源、何家栋的文章中得知毛泽东早在文革开始前一年半就把我父亲划入“另册”。文革前夕，我们的感觉依然是“阳光灿烂”、“春满人间”，根本不知道父亲的灭顶之灾就在眼前。

1966年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被停职，我父亲冀鲁豫时期的老战友，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感到压力很大。有一天，他和我父亲一起坐我父亲的汽车到家里来，应该是私下评估形势的吧。父亲虽然当时还劝慰万里：“谁做了哪些工作，大家都看到了嘛。”但他也同样为时局的发展而担忧，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已经使我父亲和他的众多战友疲于“紧跟”，力不从心了。当然，在他为彭真的倒台安慰万里的时候，还不可能想到自己后来竟然成为“彭真死党”。直到父亲屈死在刑讯逼供之中，他也肯定不明白“走资派”和“死党”的罪名从何说起。我们不能确认的是，1965年毛泽东对他的点名，他本人知道吗？如何知道的？又是何种态度？

在文革开始后的毛泽东眼中，中央委员会里的“修正主义者”已经远不止“十几个人”。1968年7月21日，为了“帮助”江青了解情况筹备八届十二中全会，康生亲自写就了一份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全员名单，将所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分类排队，以绝密件送给了江青。康生写道：

江青同志：

送上你要的名单。

现在有的人尚难定性，运动中还会下降或上升。这是粗略的排列，很不准确，仅供参考。

康生 21/7 68

江青集团被粉碎后，这份名单曝光了。在这份名单中，康生将105名（注：实际上是104名）中央委员和90名中央候补委员分别区划为“中央委员（或中

央候补委员)”、“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有病的”、“已死的”、“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及列入专案被审查分子”和“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几大类。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名单。

在 104 名中央委员中，只剩下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康生自己在内的二十人是“合格”的“中央委员”，而且罗贵波和刘格平的名字后面还加了问号，说明这两个“好人”也当得比较勉强；朱德等五位元帅、粟裕等三位大将、陈云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共十七人被划入“二档”——“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这在当时还算是“高抬贵手”的“恩典”。以下滕代远、谢觉哉、王维舟三人“有病”，我觉得这是“无关紧要”的意思；“已死的”十六人，其中后来被平反恢复名誉的有刘长胜、贾拓夫、李立三等人；划入“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及列入专案被审查分子”的竟有四十六人，占全体中央委员总数的 44%！这里面既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也有彭德怀、贺龙、罗瑞卿，既有打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薄一波、安子文，也有“一贯的机会主义者”张闻天、王稼祥，既有胡乔木、杨献珍这样的文人、也有许光达、萧华这样的军人，既有管共青团的胡耀邦、也有管工会的刘宁一；而宋任穷和舒同被列入“靠边站”，吉凶未卜。

在 90 个中央候补委员中，只有李大章、许世友、吴德、黄永胜等十七人是“好人”；杨勇、苏振华、范文澜等十二人“有错误”或需“历史考查”；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另外十二人“已死”，其中后来需要平反昭雪的有六人；被列为“叛徒、特务”之类的“坏人”竟有四十四人，打头的是杨成武，他当年 3 月才被抓起来，中间有被康生“一眼”就看出来的“叛徒特务”赵健民，殿后的是廖志高，他是四川的“李廖（李井泉、廖志高）死党”之一；“靠边站”的八人都是地方大员，如江苏的江渭清、山东的谭启龙、湖南的张平化等。

这份名单表明，堂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叛徒特务里通外国需要专案审查”者共计 90 人，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 194 人的 46%！这还不包括“历史需要考查的”、“有错误的”、“靠边站的”、“死了的”。

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党、有这样的政治集团？！

需要指出的是，“康老”有一个笔误，他重复计算了陈少敏，既把她列入中央委员的“有错误”类，又把她列入“特务叛徒里通外国”类，说明他当时还没有拿定主意。“康老”“日理万机”，当可谅解。到后来陈少敏获准出席十二中全会，竟然拒绝同意开除刘少奇的党籍，康生火冒三丈，当面指责陈少敏。从康生的角度讲，那个名单中四十六个“叛徒特务”里还得包括陈少敏。不过，中央委员的总数要改为 104 人。

审判“四人帮”时，整理这份名单被列为江青伙同康生陷害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罪行。其实我看，江青、康生迫害无辜是“中国一绝”，罪行

很多，但这件“罪行”却经不起推敲。康生写这个“绝密”名单是在1968年7月文革高潮中，那份名单中被“点”为另册者实际上都已经被打倒，被剥夺权利，康生的名单不过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那些被打倒的人并不是因为康生写了这份名单才被打倒，那个局面是毛泽东认可的。这个名单只记录了实况，写这个名单、看这个名单算不上江青、康生的罪行，它只是文革荒谬到极端的佐证。

按104名有表决权的中央委员算，超过半数需要五十三人，但把中央委员中的二十个“好人”与康生划出来的“有错误需要审查”的人加起来，也不够半数。为了凑够开除刘少奇所需要的半数有投票权的与会者，使八届十二中全会“合法”，毛泽东圈定了几个“凑数”的人，他们是“临时解放”的陈少敏、李志民、范文澜，然后将十名还算是“好人”的候补中委补为中委，凑齐五十三人，刚好超过半数。

注意，毛泽东提出“解放几个人”只是为了“凑够半数以上”，他并不认为超过半数的中央委员无权参加中央全会有什么不对。被康生列入“需要专案审查”的胡耀邦是在凑够了半数以上之后毛泽东又额外“钦点”到会的“第五十四个人”。

文革中的“好人”、“坏人”都是怎样“点”出来的呢？且看1967年2月7日毛泽东做出的批示：

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

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

“各同志”经过研究，认定只有张国华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好人”，周、王被定为“坏人”，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据此分别通知了西藏各方面。张国华曾任冀鲁豫第四军分区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七纵副政委，是我父亲的老战友，1950年率十八军解放西藏，1962年指挥了中印边界反击战，是有功之臣，当时他是西藏第一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正在北京养病。而主持西藏日常工作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周仁山和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也是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老革命。这三个人在建国后的近二十年里一直在条件艰苦的西藏高原兢兢业业地工作，现在，他们的“好”“坏”甚至生死却要在毛泽东的指令下用这种近似于“抓阄”的办法来决定，这是文革荒诞不经的众多事例之一。多少高级干部的政治生命以至肉体生命，就是用这种随意的方式“点名”决定的！王其梅后来被批斗迫害身亡。

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文革中变成了“三人行，必有我敌。”如果把文革高潮时期省部级领导干部名单排列出来，随机抽取三人，用当时的标准评

定，“敌人”、“坏人”的比例只会比三分之一多而不会少。至今还有人吹捧文革是打倒“走资派”的“伟大群众运动”。实际上，却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是被“群众”打倒的，不服，就请说出一个人的名字来。

不管怎么说，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点名”确实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甚至生死。我爸爸就直接死于江青的点名。曾参加对江青集团审判工作的王文正法官口述回忆了江青对张霖之的诬陷：

1966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一个小会议室里，江青接待了中直机关的有关人员。当陈贵干讲到煤炭部的运动还没有搞起来，部里有阻力时，江青立刻插话说：“张霖之是彭真死党！”

王文正还说：

自从江青和戚本禹的讲话之后，张霖之的“彭真死党”就被定了铁案，张霖之被无辜地拉到各种各样的大会上批斗。造反派把批斗张霖之当成了一种乐趣，逢会必先把张霖之弄出来批斗，使这位兢兢业业为中国的煤炭发展而忘我工作的部长，身心受到极严重的摧残。

不过，王文正说我父亲是在被定为“彭真死党”遭受批斗后，“此时，中央有关负责同志批准张霖之前往大庆治病”，这是把事情的顺序搞反了。我父亲经周总理批准去大庆治病是在1966年9月，而江青的点名是在12月。

实话实说，我父亲当年被批斗最残酷最厉害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任何造反派别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点过张霖之的名，他是因为“彭真死党”的罪名被活活折磨死的。他的死，江青要负直接责任。“彭真死党”是一个毫无根据又在当时能置人于死地的罪名——彭真位列“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之首。

令我们全家意外的是，1980年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公布的特检字第一号起诉书，竟没有江青迫害我父亲致死的内容。在这份起诉书第二部分《迫害镇压广大干部群众》中，列举了林彪、江青集团迫害北京市委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等同志；迫害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等同志；迫害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同志；迫害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方志纯等抗日时期在新疆被捕的同志；迫害吕正操、万毅、张学思、刘澜波等在东北军工作过的同志；迫害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同志；迫害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上海文艺界人士等等具体罪行，却没有列出煤炭部长张霖之被诬陷迫害致死的事实。这是一个明显而重要的遗漏。这真是：不该点名时被点名，应该点名时又不点名。

在一些老同志们的支持下，11月17日，我母亲李蕴华代表全家上书最高人民法院，以原告人身份向特别法庭起诉江青、戚本禹等人迫害张霖之致死的罪行。起诉书叙述了张霖之被害经过后说：

霖之同志是党的高级干部中在文革中第一个被他们阴谋迫害致死的老同志，他死的最早，也死的最惨。但我们在中央公布的受害人名单中没有看到霖之同志的名字。他的惨死不是我们一家一户的个人恩怨，而是林、江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罪行之一。

我母亲在起诉书中以被害人张霖之的妻子的身份，与子女一起强烈要求：

1. 调查审理江青等人迫害张霖之同志的罪行，并公布于众；
2. 要求按照刑法有关条文，判处江青死刑，以正国法，以慰民心；
3. 戚本禹是残害张霖之致死的元凶之一，要求捉拿戚本禹归案，归入林江反革命集团一并审理并判处死刑；
4. 要求出席公审大会，以受害者家属身份出庭作证，控诉江青等人的反革命罪行。

这个起诉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按法律标准看，原告人不应提出具体刑罚要求。但它的主要功能是对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没有列举张霖之被害事实提出了质疑和补充，在特别法庭开庭之前明确要求把江青迫害张霖之案件列入审判日程，无论对实现我们家属为父亲伸冤昭雪的愿望来说，还是对完整有效起诉江青等人的罪行来说，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这封信件送到主管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彭真手中，引起了他的重视。彭真要求立即搜集材料，并委托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刘复之等同志与我母亲面谈，直接听取家属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在1980年12月开庭审判时，江青迫害张霖之致死案列入了审判日程。我母亲作为受害人家属出席旁听了公审大会。

特别检查厅的起诉书为什么不写张霖之案件，曾是令我们疑惑的问题。我母亲当时的判断是，张霖之“畏罪自杀”说仍在起干扰作用，因此，无论如何要提出申诉，如果需要，告到邓小平那里也要告。二十多年过去了，王文正法官的回忆补充了我们从不知道的重要内幕：

在秦城监狱预审阶段，当讨论到张霖之被迫害致死一案时，我和参加预审的

某些法院的同志主张应该对江青提起公诉。因为文化大革命才半年时间，就这样将一个党的高级干部给活活打死，这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在讨论中，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光说江青诬陷张霖之是“彭真死党”，这个词表达不清楚，写起来不明确。因为作为法庭审理此案就得实事求是，起诉书必须经得起推敲，还要写清楚彭真是个什么人，张霖之怎么成了他的“死党”。

这样，对于这件事情在当时就有着两种意见，在起草起诉书之前内部就有了分歧。

因此：

细查一下当时的起诉书，在江青个人的罪行中，却没有诬陷张霖之这一条。

也许我的法律知识欠缺太多，在我摘录上述文字的时候，怎么也看不懂反对把张霖之案件写入起诉书的意见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江青对张霖之的诬陷太高深太易懂，写进起诉书会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损害了法律公正？

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递交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后：

第一审判庭包括我（王文正）在内的法官都一致提出，对于迫害张霖之这件事，必须得对江青进行审判，起诉书上虽然没有写，但法庭有权对此进行调查。

很快，第一法庭的法官们取得了一致意见。

应该感谢王文正和他的同事们主持公道，感谢王文正法官告诉我们这样深层次的内幕。但是，我母亲代表全家给彭真的上书也起了关键作用。因为即使法官们一致要审此案，在起诉书之外另立题目，也肯定要得到“上面”的批准。这一点，是我对王文正法官口述的补充。

起诉书中有江青迫害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罪名，以此为平台，法庭对江青诬陷张霖之致死的案件进行了调查审理。

审判员甘英代表法庭进行庭审调查，她问江青：“你是不是诬陷过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是彭真死党？”

江青答：“不记得了。”

为了让江青认罪服法，法庭宣读王洗尘（注：原北京矿业学院造反派头目）1977年2月27日的证词和北京矿业学院教师杨志伊的证词。二人的证词中都证明江青在1966年12月14日和12月24日戚本禹的讲话中，都讲到“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和“江青说过张霖之是彭真死党”的话。

法庭接着投影 1967 年 1 月张霖之批斗现场照片和张霖之尸体检验的照片。
王文正说：

张霖之的尸体检验照片更是惨不忍睹。只见他背部的伤口竟达三十多处，头部有一处重伤，其创深至骨膜。

谁能想到，在敌人的屠刀下都未曾牺牲的革命者，一位新中国的国务院部长，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地折磨着送掉了性命。

接着，煤炭部机关党委副书记杨克和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钟子云又当庭作证，历数在江青诬陷煽动下张霖之惨遭批斗拷打的事实。王文正说：

铁证如山，江青无言以对。

经过审理，法庭判决书对江青的这一罪行认定如下：

1966 年 12 月 14 日江青点名诬陷张霖之，使他被非法关押，并被打成重伤致死。

这是法庭最终认定的江青八项罪行之一。

从 1966 年到 1981 年，相距十五年的“点名”与审判，在这里落下了帷幕。

1981 年 1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 年 1 月 25 日，缓期二年期满，最高人民法院对江青改判无期徒刑。1991 年 5 月 14 日，江青在监所自杀身亡。

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终于走进了历史。

本文参考、摘录的书目或文字资料：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邸延生著 新华出版社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满妹著 北京出版社

《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 王文正口述 当代中国出版社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特检字第一号起诉书》 1980 年 11 月 2 日

【史林一叶】

林彪说，张霖之是个好同志

张光渝

按：本篇原载《告别元老》一书。

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七名常委毛、刘、周、朱、陈、林、邓中，我至今惟独没有找到我父亲与林彪打交道的记录，但林彪却在文革中提到了张霖之。

王秉璋是我父亲在刘邓大军十一纵的搭档，他是司令员，我父亲是政委，算作二野出身，但王秉璋同许多其他二野指挥员一样，渊源却在一一五师和红一方面军。当年林彪被阎锡山部士兵误击落马，一一五师作战科长王秉璋抢上前去扶起林彪，搂在怀里，林彪的鲜血染红了王秉璋的军装。文革初期，七机部长王秉璋也被斗得死去活来，林彪报请毛泽东同意，保了王秉璋，他不久就被重新启用，主管国防科委的工作。1967 或 1968 年的一天，王秉璋到林彪家中向他作例行的季度工作报告，谈到了文革中的混乱现象，包括张霖之的惨死。张霖之与林彪没有任何直接交往，但林彪知道王秉璋与张霖之的关系。这时，林彪说：

张霖之是个好同志。他是被戚本禹那一伙人害死的。戚本禹是刽子手！

这是王秉璋自张霖之死后第一次听到有人如此明确地说出他的死因，而说这句话的人竟是“接班人”和“副统帅”！

在我多年后（2003 年）与王秉璋叔叔的交谈中，他又一次确认了这次谈话，他说：

当时叶群也在，就坐在我的对面。

不管林彪做过什么事，说过什么话，对中共在文革中的损失负什么责任，他对张霖之的评价是正确的。

如果把出身四野、在文革中被林彪提拔重用放在关键位置上、与林彪叶群关系密切的人划为“林彪集团”，那么确实也有许多人的亲属、长辈在文革中受到这个集团的打击、迫害，甚至被整死，这是事实。与之相对的，是文革新贵们组成的“江青集团”，这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无战功、无民望、无根基的“三无”集团，完全是靠了毛泽东个人的扶持才能撑上十年之久，戚本禹就属于江青集团。

虽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都形成于文革、得势于文革，但对文革权力分配、走向目标的认识却大相径庭。常用的所谓“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这个概念，没有反映出这两个集团相互对立、水火不容的事实。

张霖之的悼词中称张死于“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迫害，这是评述文革中遇害者遇害原因时通行的政治用语。文革就是这样一场奇怪的政治运动，中共的纪年中就有这样一段难解的历史。经过文革的一代人，有责任有义务把那段独特的经历记录下来，流传下去，让比我们更聪明更客观的后辈去研究评说。

与其告诉后辈们结论，不如告诉他们过程。

【史林一叶】

话说“联动”

张光渝

按：本篇原载《告别元老》一书。

栗寒生，现在姓郑，是他从海军转业时，父亲栗裕给他更的名，改的姓，理由是姓栗的很少，到了地方可能会“特殊化”。

我知道他姓郑，大概是1996年前后。再次见到寒生是2006年新年过后的聚餐，年近六十的寒生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他的父亲。我把我父亲的传记送给他，他马上说：“淮海战役那时候你爸爸和我爸爸在一起啊。”我说：“是你爸爸的部下。”

“那时候”是从1947年8月算起，我父亲当政委的中原野战军十一纵刚成立就在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的指挥下作战，直到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包围黄维兵团，十一纵才正式归还中野刘邓指挥，而双堆集打黄维的活儿也是中野华野一块儿干的。

说起长辈对自己的影响，饭桌上，他讲起了文革中被当成“联动头目”送进监狱的经历。

讲寒生的那段“古”，就要先从“联动”的来历说起。

“联动”（全称是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曾自称“联委会”）是一个历史专用名词，知道的人很多，真正了解的很少。一般人的概念里，北京的高干子弟，文革初期（1966年下半年）大都是“联动分子”。但据我所知，“联动”的正式成员并不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真正要干什么“联合行动”的事情，就会招集一批“乌合之众”，刷标语，散传单，进攻“造反派”，这些行动都具有随意、偶然、卤莽的特点。“联动”的标识是在左臂戴一个一拃宽的无字红色袖章，谁认可联动、谁支持联动，谁就可以自己搞一个袖章戴上。

联动的前身“西纠”、“东纠”、“海纠”（即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和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的简称）成立于1966年8月左右，背后有周恩来通过当时的“联络员”周荣鑫和北京卫戍区的扶助支持，意在维护一下文革初期越来越混乱的秩序。“红卫兵纠察队”，含有“超级红卫兵”的意思，成立之初也确有代替日益涣散的各级政府机构维护社会秩序的想法和行动。西城区纠察队连续发了十个“通令”，企图以“权威”身份规范文革运动。比如其1966年9月3日的第五号通令，题为“关于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意见”，明确提出“在今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及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针对当时从北京驱逐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情况，西纠的9月9日第七号通令“关于驱逐地富反坏离京的意见”，明确驱逐对象是从外地逃亡、流窜到京的地富反坏，或隐瞒身份查有实据的人员。通令提出，资本家、右派和摘帽右派、有历史问题的人“不必离京”，交原单位监督审查。

但是，这些“通令”的题目都是“意见”，说明通令起草者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也有些含糊。事实证明，这些“通令”也基本没起什么作用。今天重述，只是为了缕清红卫兵纠察队成立的初衷。

据我所知，除了少数核心人物以外，“纠察队”并没有固定的成员，也没有统一正规的加入手续，很像是一种需要“自知之明”的“带不带你玩儿”的游戏。当时有“资格”加入这个纠察队的大都是干部子弟，“出身不好”的被排斥在外，大多数职工和市民子弟只能冷眼旁观。我所执行的1966年8月18日和8月31日天安门广场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大型集会的“标兵”任务，通知我去，我就去了，没有任何其他程序和环节。当年北京八中的同学吴新潮回忆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情况：

（8月）31日上午，我接到国务院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要我们北京八中以及四中、三十五中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接受警戒任务。中午时分，我们列队到达天安门城楼前，和中央警卫团取得了联系。不一会儿，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来找我们，要我们负责金水桥到天安门城楼之间的警戒线。

那时候，能上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合影的，在金水桥前当标兵值勤的，大多数是干部子女，其他人也要是“红五类”出身。但当时正在激烈辩论的那副“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并不是所有干部子弟都赞成的。我曾经参加过7、8月份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一次“辩论会”，邓小平的女儿（记不得是邓楠还是邓琳）上台自报家门，明确表态反对这副对联。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倒”，她亮明自己的身份是为了发表意见

时立场站得住。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个口号的错误，而在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封建传统深远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就长期存在这种血统论，对联不过把它挑明了而已。虽然中央文革也出面批驳对联，但至少在十年文革中，无论赞成还是反对这幅对联的，谁的命运都没有逃脱对联的支配。文革中打倒了许多原来自认“革命血统”的青少年们的父辈，这些青少年当然也就不再是“好汉”，但那些没有被打倒的，新上了台的，仍然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而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后代们，照样是没有“混蛋”公开称谓的二等、三等公民，当兵、进工厂、上大学，都没他们的份。十年文革没有改变血统论，反而十倍百倍地放大了血统论。

文革初起时，只想革别人的命，没想到其实我们“保卫”的是一场矛头指向自己父辈的政治清洗运动。到后来才意识到，即使是“革别人的命”也是错误的。文革初起，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环境下，各色“红卫兵”都干了不少打砸抢的勾当。不过那时的受害对象还主要是过去的旧人员和学校教职员工、有所谓“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家庭及一些闲散平民。

在1966年夏天“破四旧”高潮中，毛泽东把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找去汇报，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吴德汇报了社会上的混乱情况，说市委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希望中央采取措施，但是：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寻常的思维方式缓缓地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原来，红卫兵运动初期的那些血腥事件，是以“超乎寻常”的“雄才大略”为根据的。既然“运动”了，不死人是不可能的，如同反AB团、肃托、抢救、土改、肃反、反右等等运动一样，死人是必然的，文革不过是一脉相承而已。我去抄过资本家和“历史反革命”的家，到玉渊潭公园参加过“抓流氓”的行动，批斗过校领导和老师。2005年见到两位当年参加过联动的同学，他们回忆往事，为自己的蛮干后悔不已，但他们一致认定“光渝没有打过人”。记得当时父母对我们社会上的“革命行动”很不以为然。妈妈说：

你们都被街道和派出所那些人当枪使了。

“纠察队”转为“联合行动委员会”，是1966年年底的事情，联动的主要发

起者是“海纠”——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那里一〇一中、八一中学、十一中学以及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高校附中十分集中，干部子弟“成堆”。联动的发起人牛皖平、于增寿、卜大华、宫小吉等都是出自这些学校。清华附中的卜大华是全国第一支红卫兵组织的发起人，这支红卫兵喊出的“造反有理”的口号曾得到毛泽东“热烈支持”的赞言。据考证，“红卫兵”这个名词最早也是出于清华附中高二学生张承志办的墙报，现在的张承志是一位知名作家，而北大附中的牛皖平当时已是学生党员。宫小吉更非同一般，他也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在1965年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五分的秘诀》，列举如何得五分的“诀窍”，指出这样考出的五分实际没有用处，学生无须单纯追求成绩，三分四分足矣，应当注意多方面实际能力的提高。《中国青年》杂志在同年第六期上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因为文中的思想与他对学习的态度是一致的。毛泽东随即做了批示，并称“此人厉害”。

实际上，宫小吉等干部子弟有自己的信息渠道，毛泽东早些时候对教育革命的指示他们已有耳闻，并引起共鸣，才能写出那篇文章。不要小看这些“渠道”，在那个封闭的社会环境中，谁能早一步获知“上面”的“风向”，谁就能先行一步。这也就是为什么发起红卫兵运动的是干部子弟的原因。

但到1966年底，曾受到毛泽东肯定和鼓励的这些青年人却对“革命”和“造反有理”产生了新的理解，对“上面的风向”产生了怀疑和抵触。如果说“纠察队阶段”的干部子弟还自认为“正统”，对文革运动采取积极拥护的姿态，那么此时，联动所代表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已经把“革命造反”的矛头从社会转向中央文革，从正统转为叛逆。

由宫小吉执笔的《成立宣言》将联动的任务定为反对“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这句话前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对文革运动的压制和对造反群众的打击，这是毛泽东定的调子。而后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则是指对老干部以及他们家庭的大规模冲击和迫害，这个定义是联动这些中学生自己做出来的。

1966年11月27日，包括上述骨干分子在内的一些中学生在北大附中首先秘密发起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意为“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和“海淀区纠察队”的联合体。12月5日发布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联动成立伊始，就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央文革，提出了“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的口号。

“联动”的成立“仪式”实际上是在1966年12月5日，这一天，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邹建平等爬上了西直门城墙，刷下了一条几十米高的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同时，在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大街也

出现了“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坚决保卫革命的老干部!”等大标语。

“联动”存在期间，最有影响的是组织了从1966年12月16日到1967年1月11日之间连续六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同学的行动。干这种事情的，大都是干部子弟，军队的地方的（政府机关）的都有，“高干子弟”、“中干子弟”都有。但并不是联动成员才参加这些行动，相反，谁参加了这些行动，谁就算是联动成员。

我当年就听一位同学讲起他如何碰巧“赶上”参加了某一次冲击行动，而使他最得意的竟然是在公安部大食堂里吃了好多好吃的东西（这是联动六次冲击公安部中的第四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进入公安部的行动，其余五次都是“冲”设在公安部院外的接待站或冲击大门未遂）。他的经历为后来由官方举办的“粉碎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所证实——1967年1月6日近午夜时分，打着联动旗号的一批中学生冲进了公安部大院，他们砸了礼堂内的一些设备后意犹未尽——展览会的解说词原文如下：

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又转而进食堂，把食堂的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一边吃还一边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他妈的，公安部的猪头肉真好吃”！真他妈是一群下三赖！

“国骂”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比如一首红卫兵战歌就唱道：“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所以正式展览的解说里有那个词也并不为怪。

虽然联动追随者的行动很卤莽，但他们的诉求却很清晰，“联动”显然成了逆潮流而动的“反动”，请听他们在冲击公安部时喊出的口号：

强烈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
公安部执行了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
公安部挑动群众是一个恶毒的政治阴谋！
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
不许公安部乱抓革干革军子弟！
乱抓老红卫兵绝没有好下场！
强烈要求为被抓的红卫兵平反！

1967年1月下旬，中央文革一声令下，北京高校造反组织和一些工厂造反派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对设在北大附中的联动总部及各校骨干分子采取突然行动，逮捕了一百多人，联动被正式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因此实际上，联动

从正式成立到被“粉碎”只有两个月时间，主要活动也只集中在北京城区和西郊，但其影响却很大。总之，与其说联动是一个组织，不如说是一种思潮。

我从1966年9月就外出“串联”，从北到南往返两趟，最后回到北京已是12月初，那时我和学校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12月14日江青点了我父亲的名，我们一家自顾不暇，顾不上到外面“闹革命”。没想到的是，江青在那前后还点过栗寒生的名。寒生在酒店的餐桌上给我们讲：

当时我是十三中的。那天一个同学叫我到北展剧场去参加红卫兵集会，我就去了。大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台下与同学聊天，突然听到喇叭广播：“十三中的代表栗寒生请到主席台上来”。原来每个学校要有一个代表，而我不知为什么、被什么人推为十三中的代表。那一天全场都只记住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因为别的学校的代表都已经在主席台上，没有“点名”邀请。

栗寒生提到的那个大会是1966年12月26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的联动“破私立公誓师大会”，是“联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正式集会。在这个会议上，有人公开喊出了“中央文革不要太狂了！”的口号，得到极其热烈的喝彩和长时间的掌声。而栗寒生的名字在这样的大会上被专门提到，就成了“出头椽子”。我看，这也是出身惹的祸，谁让他爸爸官大呢。那样的场合，他不当代表谁代表？

寒生说：

过了些日子，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宣布，栗裕的儿子栗寒生是联动头目，要我爸爸“大义灭亲”。那天我看到我爸爸回家后把妈妈拉到房间里嘀咕了好长时间，出来后就问我是不是“联动分子”。我说我绝对不是联动，还讲了那次开大会的事。老头子说，你不是就好，但是既然江青说你是联动，接受一下审查，把问题搞清楚也好。他就叫秘书把我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把我关进天安门旁边的一处地方，过了些日子又被转移到陶然亭的半步桥监狱里，算是正式坐牢了。

寒生说，狱中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饿肚子，每天只给四个一两的窝窝头和白菜汤。好在楼下是女“联动”，“千金”们咽不下那些玉米窝窝，楼上的“男犯”就把被子的缝线拆下来，顺到楼下“钓”窝头，也算是苦中作乐。

说是因为“高干子弟”被关进去，实际上他们的出身还是起正面作用的。栗裕1958年被彭德怀主持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整下去靠边站，文革中因祸得福没有被打倒。栗寒生在联动全体释放之前就先出狱了，他说自己是受“优待”的。

“联动”们被集体释放的那一天是1967年4月22日。当天，周恩来、江青等人

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不是“高干子弟释放犯”，能享受这种待遇？

被释放的青年学生们见到了几个月前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过的周恩来，还有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周恩来向前走了两步，问道：“有没有清华附中的？”清华附中老红卫兵、联动的发起人之一卜大华站起来，还没开口回答，就哭出声来，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在他身后，站着他的同学们。周恩来看到这些衣衫褴褛，眼泡浮肿，头发蓬乱的晚辈们，心里也不是滋味。

周恩来继续问：“董良翮在不在？”满面泪痕的董良翮站起来，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儿子，周恩来点到他，是为了确认他在场。周恩来接着问：“谁是孔丹？”孔丹站了起来。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他说：

你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们，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党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在场的老红卫兵，周恩来认识不少，他们许多人的父母亲是周恩来的老熟人、老部下。孔丹的父母与周恩来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这些子弟身陷囹圄，他们的家长也都自身难保。周恩来一一叫着他们的名字，亲切地交谈着。他高声说道：

这次在这里见到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宾到广州，发现抓了许多人，都是些孩子，这怎么行呢？不能不教而诛嘛！回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不要抓嘛，放回去嘛。’……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此时，江青说：“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顿了一下，江青问道：“谁是牛皖平？”牛皖平站了起来。江青笑了笑，说道：“啊，久闻大名，今天才见到。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牛皖平没有回答，也没办法回答。江青说：

骂吧，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骂的，也是骂不倒的。你们还小，还不懂得斗争是艰巨的，也是复杂的……

这场极其特别的接见在口号声中结束。文革初期的那批红卫兵，就此消失在文革高潮的政治舞台上，分别奔赴了农村、工厂和军营，迎接现实生活的严峻考验。据我所知，我的同班同学刘亚铁当时就是以联动罪名在广州被捕的，理由是他们可能偷渡香港。他后来对我讲述那段“冒险史”时，还不知道周恩来的广州

之行与他们那帮人被释放之间的关系。1967年，刘亚铁同学在上山下乡运动还没有开展以前就自愿到北大荒去了。我的另一位同学孟建新也是在那段时间穿越中越边境，找到抗美援朝的中国部队要求参军打“美帝”。部队表态，精神可嘉，礼送回国。

多少年过去了，那批“联动分子”中的一些人还有时会在4月22日这一天抽空聚一次，共同回味那段不可复制也不应复制的经历。当年这些发起红卫兵运动的热血青年以为自己在创造历史，后来才发现，那是历史给他们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当然，他们也在这场“玩笑”中领略了许多终生受益的东西。

说实话，联动当年的政治口号是符合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干部子弟胃口的。1967年元旦，联动以“中央字003号通告”的名义号召全国干部子弟联合起来，“保卫革命成果”，“保卫老一辈打下的江山”。请看原文摘录：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 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 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

3. 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 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 保卫党的各级优秀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女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的啊！人民盼望着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公开发布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通告，公然要“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破天荒提出只忠于“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如果不是“高干子弟”们干的，早就被枪毙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能够公开喊出这些口号而不受镇压的，只能是老干部的子弟。

1967年1月，我父亲和许许多多老干部确实正处于“公告”中指出的“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的境地，它无疑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当然，我并没有参加具体的“联合行动”，许多人也没有参加具体行动。但这并不能避免出现诸如把陈小鲁说成是持有“双枪”的“联动总头目”那样的社会舆论。为了避风头，周恩来在亲自询问陈毅，得到他保证儿子不是联动的承诺后，让陈锡联把陈小鲁安排到了沈阳军区的农场劳动。

寒生后来当了海军，从部队转业后进了中远公司当海员，跑船，当船长。他曾经从单位分了一套房子，虽然并不违反规定，但粟裕知道了，仍严令寒生退掉住房。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寒生和我等都是文革的亲历者，都是那场“红卫兵运动”的亲历者，都是沾了长辈的光也倒过长辈的霉的“革命后代”。今天我们在谈笑中话说当年，其实也只是触及皮毛和片段，亲历者实际上往往说不清楚自己言行和见闻的全部内涵和意义，历史经验都是后人总结出来的。曾有一本书名为《告别万岁》，是反思个人崇拜、极左路线和阶级斗争为纲种种人祸的时论文集。多少年后，是否还要出一本书，名曰《告别革命》，反思那些打着“革命”和“群众运动”的旗号排除异己争权夺利的历史悲剧？

南京大学丁帆教授曾论及联动，他说：

也许，“联动”留给“文革”和后世的一个最值得注目的惊叹号就是那一条标语：“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当历史翻过一页又一页的时候，我们再来检阅这“文革档案馆”里的陈迹，不得不慨叹历史的无情与严酷。

依我的看法，文革的“史无前例”在于，无论是革命的发动者还是革命的对象，无论是拥护者还是反对者，竟然没有任何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那场运动中得到任何实际利益。

回头看那段历史，“红卫兵”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是被独裁利用的工具。所谓“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在文革中完全是一句虚伪的煽动性口号，它的实质是“奉旨造反”，不是“谢恩”就是“谢罪”。

文革最初的产物红卫兵很快掉过头来反对文革的发动者，是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文革的损害。干部子弟的那些利益一部分被认为是“特权”，但还有大部分是与全民族利益一致的，人们往往注重前者，忽略后者。“联动”这个不受社会多数人“待见”的“小圈子”出于本能提出的一些幼稚偏激的口号中，之所以还能够包含着某些惊世骇俗、被历史证明正确的东西，就是出于上述原因。

本文参考、摘录的书目或文字资料：

《孔丹自述：难得本色任天然》 米鹤都 中港传媒出版社

《毛泽东的车“抛锚”了》 吴新潮 《老照片》第15辑 2000年9月

《十年风雨纪事》 吴德口述 当代中国出版社

《粉碎“联动”反革命组织展览会解说词》 1967年2月

《血色正淹没于浪漫之中——关于“联动”和“血统论”》 丁帆

《红卫兵档案》 吴过

【阅史漫笔】

利用“叛徒”罪名进行政治斗争是很坏的传统

张光渝

按：本篇原题为《谁是叛徒？》，载《读书鉴史：解读周恩来》一书。本刊删节了原文中非文革内容的第一部分“谁出卖了瞿秋白”。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为什么说六十一人不是“叛徒”？

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不能不说是为了达到“伟大战略部署”而采取的政治性选择。但是这个案件能够成立，也是中共党内对被捕、出狱问题一贯十分敏感的结果。要一劳永逸地打倒刘少奇，光说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国的赫鲁晓夫”不行，那是可以“翻案”的，只有把他定为“叛徒”，才能同仇敌忾、铁案如山。而刘少奇正好被捕过，他没有被杀，而是获释，就有了把他定为叛徒的想象空间。

刘少奇是叛徒，在刘少奇指令下具结“反共启示”走出国民党反省院的六十一名中共高级干部也就理所当然成了叛徒。这是摧毁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捷径。所谓反省院，就是将刑期已到，但拒绝声明反共的共产党员继续关押的特殊监狱，实际上是将有期徒刑变为无期。

1936年，中共中央为了赶在日军占领北平之前救出被捕同志，经张闻天、毛泽东同意，指示在北平反省院的人可以具结出狱，主持这个行动的是刘少奇。事后，为了明确此举的性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当天），中央组织部做出《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其中第三条规定：

“凡在狱中表示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曾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

复其组织。”（《陈云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释 145）

四年之后，1941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过去履行出狱手续者（填写悔过书声明脱党反共）暂行处理办法》，其中第二条规定：

“共产党员在被捕后，毫无叛党行为，仅仅在刑期满后或交保释放时由自己或家属填写过‘悔过’‘自新’一类文件作为出狱手续，而在出狱后仍然坚决革命，并未改变其革命本质，并未对革命发生动摇者，虽在当时中央并无允许履行这类手续之决定，应视为实质上并未叛变。因此出狱后经地委以上审查和认可之后，已恢复党籍者仍然不变，未恢复或恢复后又被开除者，则在本人要求恢复时可恢复其党籍。但在党表上应登记此种出狱情况，以区别于过去拒绝履行出狱手续坚持无条件出狱者。”《陈云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释 146）

这个处理办法更权威，是中共中央做出的；更宽泛，即使是未接中央指令，仅仅是为了获得出狱机会而签据反共声明的，只要实际上没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叛变行为，仍可恢复党籍，但要注明情况，以区别于没有履行手续无条件出狱者。

在尖锐复杂的对敌斗争中，保守组织秘密，坚守政治信仰和与敌周旋、保存自己的行为并行不悖。上述两个文件适应特殊斗争性质的需要，是完全正确的。六十一人没有出卖组织，没有投降敌人，他们的出狱是正确的对敌斗争策略，也完全符合组织手续。

但在文革期间，这两个判定被捕人员出狱标准的重要文件谁也不再提起，这是“选择性办案”的典型事例。按照这种思路，敌人抓到你，就只有死路一条，活着出来就是叛变——你没有被杀，就是罪过。

江青如何成了“叛徒”？

文革中这一实用主义的恶劣先例一开，“抓叛徒”就成了一柄双刃宝剑。几乎所有在战争年代坐过敌人班房的干部都被打成叛徒，连没有坐过班房的周恩来也险些中招。他在被推入手术室之前，之所以还要亲笔在有关历史材料上郑重签名批注，申明自己不是“叛徒”，就是因为这是毁灭他一生名节的最大威胁。叛徒不叛徒，在一定条件下，说你是，你就是。

但是，这柄“抓叛徒”宝剑的另一刃，却指向了文革中“抓叛徒”最起劲的江青。与周恩来被敌人有意编造诬陷不同，江青确实被捕过，按照活着出狱就有嫌疑的标准，她政治上也很危险。实际上，利用江青被捕历史对她发起暗中攻击的行动，几乎贯穿文革始终，因此抄“黑材料”，烧“黑材料”，就成了江青最关心的事情之一。

江青于 1934 年在上海被捕，两个月后被保释出狱。国民党对中共人员有“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极端行为，但那并非常态。一些政治面目并不清楚，党员身份没有完全暴露，或者对方拿不定主意的情况下，通常就可以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保释。即使被证实为共产党员，国民党的司法系统也会按照情节和身份判处不同年份的徒刑（当然也包括死刑），刑满后具结（即签署反共声明一类的文件）释放。刘少奇、江青的出狱算前一种（保释），薄一波等人的出狱算后一种（具结）。文革中，江青亲自出马，将刘少奇、薄一波等统统定为叛徒，自己也就同时被逼上悬崖。

江青被捕时的上级领导是徐明清，江青出狱后得到了徐明清很多照顾。但第二年徐明清也被捕了，1936 年才被保释。也就是说，她出狱的性质与江青一样。到了文革中，江是“旗手”，徐是叛徒，而江青接到当年对自己关照有加的老上级的求援信后不闻不问。不过，按照江青在文革中的手段和作为，她留下徐明清一条命，已经算很不错了。

江青倒台了，徐明清却更倒霉了。她的被捕经历，她与江青历史上的密切交往，全成了她的政治包袱。文革虽然结束，但用“叛徒”的称号置人于死地的旧习却没有随即改变。为了给江青定更严重的罪名，办案人员迫使徐明清写出江青自首叛变的证明。1977 年 3 月，《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的中央文件向全党全国公布了如下一段话：

“1933 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 1937 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 10 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既然江青是叛徒，她的上级徐明清也得是叛徒，这叫“捎带”，是一种政治需要。后来徐明清平反了，江青的“自首叛变”帽子却没有宣布摘掉。当然，在以后的所有正式文件和媒体宣传中，都没有再提及江青的“叛变”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存在。

什么叫叛徒？谁是叛徒？

叛徒就是背叛信仰，出卖组织，投降敌人。这个定义很简单。但掌握起来却很复杂。

党内多年利用“叛徒”的罪名进行政治斗争，是一种很坏的传统。实际上，刘少奇、薄一波、瞿秋白不是叛徒，江青、陈伯达（他被毛泽东在 1970 年庐山会议上钦定为“叛徒”、“特务”）、张春桥也不是叛徒。经过严密的、反复的、矫

枉过正的整党审干多次运动，早在文革前，“叛徒、特务”就基本只成为一个概念了，不能说没有漏网者，也已极为个别。但是文革继承和发扬了党内对被捕人员审查处理的“左”的恶习，丢弃了曾经有过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康生在临死前向王海容、唐闻生“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那是他的最后一次政治投机，他依据的是“文革标准”。殊不知，按照这一标准，康生他“老人家”本人也有“叛徒”嫌疑，因为他1930年曾在上海租界被捕，关了三天后获释。（凤凰卫视中文台2013年4月27日《我的中国心》专题：《牟宜之》）这是很有“杀伤力”的三天。

张春桥在济南上中学期间，加入了国民党复兴社组织。看起来这是将他打翻在地的最佳理由。但实事求是地讲，当时国民党为扩大自己的势力，通常是搞“集体加入”的，即将一个班，一个年级，甚至一个学校或单位的人全部划进去。张春桥就是这样卷入的。（《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丁三 著 语文出版社出版 137页）单纯从这样的“加入”判定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片面的，是不符合事实的。

今天，如果我们仍然拿文革时的老观念来议论历史人物，以为把一些“负面形象”与“叛徒”联系在一起会更有说服力和杀伤力，那就错了。江青的可恶，恰恰在于她本人是个有一定资历的共产党员，却把众多老共产党员置于死地。她以及她的那些同伙是在加入共产党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左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逐渐膨胀，权力不受制约，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才变得越来越恶劣的。一定要给江青、张春桥等人扣上“叛徒”、“特务”的帽子才觉得踏实，是没有自信的表现，也不利于正确总结历史教训。

【阅史漫笔】

“九一三”林彪飞行目的地的逻辑推理

张光渝

按：本篇原载《读书鉴史：解读周恩来》一书。

李德和舒云合作编著的《林彪日记》（明镜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但不知为什么作者要将年谱称为日记。本书的可取之处是收集了林彪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讲话、文章和主要活动，为研究林彪的历史提供了迄今最为详细的文字资料。

按照年谱的体例，要全面、客观地反映传主的生平，不带主观评论，也不可做有倾向性的选择。但是作为林彪的秘书，李德似乎很难完全做到这一点。比如，在第十一章“1970——1971”的前言中，编著者称，1971年9月12日深夜，“林

彪说去大连，但知不知道去苏联还是一个谜”。（《林彪日记》下册 1175 页）

在这里，编著者以林彪曾说去大连为理由，将林彪飞往苏联的行动暗示成某种违背他的意志的强制行动。对此，如果研究“九一三”事件的历史，可以作为一个课题提出和讨论，但作为年谱，做这样的暗示或推测是画蛇添足，或是混淆视听，因为它违背了年谱要求的纯客观记录事件的基本要求。

更进一步说，编著者在这里做的主观推测缺乏客观事实，也违背基本逻辑。本文就此与编著者提出商榷。

一、北戴河林彪寓所发生的公认事实

逻辑很重要，它是思维判断能够符合客观事物原本内在关系的有效工具。我们判断一个历史事件，往往不能完全掌握细节，此时根据基本事实做出的逻辑推理可以帮助人们尽可能得出符合事件要素逻辑关系的结论。剩下的部分，则由可能在以后发现的新史实补充修订。

1971 年“九一三”，林彪知不知道去苏联，是个“谜”吗？或者说，他真的想去大连吗？

1971 年 9 月 12 日夜到 13 日凌晨，北戴河林彪住所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目前众说纷纭，许多细节互相矛盾，莫衷一是。就此只能根据公认的基础事实作为前提加以逻辑推断，得出能够站得住脚的结论。

以下是“九一三”事件林彪飞行目的地逻辑推理所依据的公认事实，只限于 1971 年 9 月 12 日晚到 13 日凌晨林彪北戴河寓所发生的事件。所谓“公认”，指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拥林”还是“倒林”，都一致承认的事实。

第一、林彪一家住在北戴河，林的儿子林立果是 9 月 12 日晚乘专机从北京飞到北戴河的。

第二、林彪、叶群为林豆豆和她的未婚夫举行了订婚仪式。林立果向姐姐姐夫表示祝贺。

第三、林立果到后，林豆豆察觉情况反常，认定林彪处于危险之中，可能被人胁迫逃跑，而造成这种危险的是叶群和林立果。林豆豆下决心向中央报告，要求阻止林彪离开北戴河。周恩来接报，查问林彪专机的去向，还和叶群有过通话。

第四、林彪、叶群、林立果果然急匆匆乘车而去，奔向山海关机场。在此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林彪的警卫干部李文普负伤。而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却没有和林彪、林立果父子一起走。

以上四点，就是“九一三”事件当天（严格说是 9 月 12 日午夜前后）发生在北戴河林彪寓所的公认的事实，是做出逻辑推理的前提条件。

从“公认”这一标准出发，更为了尽可能符合客观事实，下列说法不用于推理：

1. 周恩来查问林立果所乘专机时与叶群说了什么话；
2. 林彪是否在当晚说自己“至死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林彪日记》注释称此话的出处来自张宁，而张宁称是林彪的内勤讲的。《林彪日记》下册 1202 页）；
3. 当晚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是否在无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过谈话以及谈话的内容；
4. 林豆豆及北戴河警卫部队负责人与北京有关方面的通话内容；
5. 林彪上车后是否问了伊尔库茨克的方位；
6. 林彪警卫李文普负伤是他伤还是自伤。

之所以不将上述因素列入逻辑推理的要素，是因为这些内容或是一面之词，或是完全不同的两面甚至多面之词，互相矛盾，或者即使有某种结论也不能为肯定和否定双方共同接受。更重要的是，《林彪日记》也未对这些要点做明确或可信的客观记录，因此一律排除在外。

根据以上逻辑推理依据的四项公认事实，会得出什么确切的不可否认的推论呢？

二、关于事件出于偶发而不是蓄谋的推论

林彪并未事先决定 9 月 12 日晚上或者 13 日凌晨离开北戴河。他和叶群匆忙离去与林立果当晚的到来有直接关系。林立果到达前和到达后林彪、叶群、林豆豆情绪和行为的巨大反差说明了这一点。没有到最紧急的关头，林豆豆不可能下决心在接受了母亲和弟弟对自己的婚姻祝福后又举报他们。

推理的结论是：“九一三”事件并非“预谋”，既不是林彪的预谋，也不是周恩来或毛泽东的预谋。如果说“九一三”是针对林彪的“预谋陷害事件”，那就要从林豆豆查起。没有她的报告，就没有今版“九一三”事件。

三、关于林彪行为反常的推论

如上所述，林彪等人是在没有事先计划好的情况下，甩开警卫部队匆忙离去的。其匆忙的程度可以从没有带上林豆豆和张宁就不辞而别来验证。林彪没有带林豆豆和张宁，一个可能是来不及找她们；一个可能是不愿意连累她们，或者不信任她们，因为她们两人确实是局外人。二者必居其一，再没有其他理由来解释这件事情。究竟还有什么原因使林彪夫妇扔下自己的女儿？如有，愿闻其详。这

是从离去的匆忙上判断其反常，而匆忙是公认的事实，铁证如山。

反常还在于，林彪的去向是哪里？除去境外，如苏联，无论是北京、大连、杭州还是广州，就算是有我们不知道的正常原因使林彪必须连夜飞去，他为什么不带自己的女儿和刚与女儿订婚的女婿，以及未来的儿媳？他是为了避险？北京、大连、杭州、广州，只要是在中国国土，哪里更安全，哪里又更危险？普天之下，莫非“毛”土啊！李德和舒云是否能想出一个林彪在半夜三更急匆匆丢下自己的女儿，甩掉警卫部队而必须赶到大连的理由？

四、关于林立果确有地下活动的推论

林彪为什么匆忙离去？唯一的解释是，林立果的到来，给林彪带来了不走不行的坏消息。我们不知道林立果对自己的父母说了什么，但如果林彪及其家人没有不可告人的原因，都无需连夜不经正常程序匆忙乘机转到另一个城市或地区去——即使真的要去大连。

林立果会带来什么消息？抑或周恩来接到林豆豆报告后又对叶群说了什么？

——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要收拾林彪？

——九届三中全会要批判林彪，撤他的职？

——要彻底打倒林彪，把他弄成刘少奇第二？

谁还能想出更坏的消息？这些消息哪一条使林彪和叶群必须连夜离开北戴河跑到大连或任何一个中国的城市？他们离开后就能避免这些结果吗？

事实不明的时候，逻辑可以帮助我们辨别方向，如同我们不知路向，但至少可以从天上的星辰推知东西南北一样。我们虽然不知道或不能公认林立果、周恩来先后给林彪夫妇提供了何种信息，但常识告诉我们，林彪连夜飞到中国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避免上述我们想到的最坏结果。除非：一、他飞到境外，如苏联；二、他在中国境内某地能够采取对抗和自保措施。而无论是飞到境外避难还是转到某地组织对抗，无论从中共的历史传统上说还是从当时的国内环境上说，林彪都是自取灭亡。林彪自己公开宣布过：“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但他居然不惜冒这样的风险，这是为什么？

因此，促使林彪决心冒险匆忙起飞的坏消息，肯定比上述设想的三条更为凶险，那就是：林立果告诉林彪，自己在空军搞的地下活动有暴露的危险。当然，这一点并非“公认”，似乎违背了本文开头只使用公认事实作为推理基础的承诺。能够为我这个观点作证的反倒是《林彪日记》。9月8日，“日记”载：“林立果瞒着林彪回北京看牙。本来7日他就想回北京，被林立衡劝阻。林立果对林立衡

谈了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并谈了他的三点方案”。《林彪日记》注释称，林立果所说的“三点方案”为：“上策刺杀毛泽东，中策南去广州，下策北去苏联。”（《林彪日记》下册 1201 页）。注意，如今被许多人否认的“政变”意图，在《林彪日记》中却以文字形式记录了下来。

林立衡为何劝阻林立果去北京“看牙”？“看牙”为何瞒着林彪？我们都暂不讨论。常识告诉我们，能够把这样机密的两人谈话说出来并可以写到书里，只能出自林立衡之口。不管林彪事先是否知道林立果的“小九九”，也不管林立果的异想天开是否有谱，但这种地下活动和暗中策划一旦曝光，也足以毁灭林彪一家的政治生命。林立衡之所以站出来向中央报告，就是因为她知道了林立果居心的可怕后果，只有“大义灭亲”才能保住自己，更希望能保住父亲——她想“灭”的是自己的母亲和弟弟。

与林立果的暗中活动形成证据链的，是“九一三”凌晨周宇驰等人劫持直升飞机外逃未遂后的自杀和被捕。这两个相继发生在同一天的非同寻常的事件，绝不是无缘无故的巧合。

除这样的解释之外，我期望征得更具有公认力的解释——林彪为何采用非常手段连夜匆忙离去（不用“逃跑”一词，因为那不在公认范围，而“匆忙离去”是谁都不能否认的）？这是为“九一三”事件定性的关键环节。

五、关于李文普枪伤无关“九一三”事件性质的推论

林彪的警卫李文普在林彪一行匆忙离开寓所时跳下汽车，身负枪伤。从李文普负伤这一公认事实出发，得出的结论是：林彪离开北戴河确实是一个非常事件。

但是，李文普负伤的性质遭到质疑，有人说他是自伤，又给这场突发事件增添了诡异的一笔。对此，《林彪日记》正确地采取了客观陈述的方法：“林彪汽车跑出约 200 米，李文普叫停车，他从车里出来。这时连响两枪，李文普左上臂负伤。”（《林彪日记》下册 1203 页）

“连响两枪”，却没有主语，就有了他伤和自伤两种可能。从“自伤”的认定出发，有人推导出了“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或者其他势力针对林彪的“阴谋”论。这个推理是：李文普是陷害林彪的阴谋参与者，他在最后关头跳下汽车，一为避险，免得与林同归于尽；二是栽赃，用自伤的方式诬陷林立果（李文普说那一枪是林立果打的）。

实际上，不管怎样讲，当时的李文普也不可能知道林彪后来的结果。但他和林豆豆一样，察觉了反常。林豆豆察觉反常后电告北京，李文普察觉反常后跳出汽车，为什么林豆豆可信而李文普不可信？

就算李文普确实是开枪自伤，那也不过是他自保的一种应急行动，企图给自己跳车一个合理的理由。无论这一行动值不值得肯定，但对“九一三”事件的性质并无影响。说李文普参与了对林彪的绑架或者误导，逻辑不通。林彪、叶群、林立果被李文普煽动或胁迫乘飞机逃跑，而李文普自己却从汽车上跳下来？这不是在破坏飞走的计划吗？

还有人认定，既然李文普自称被林立果开枪击伤是假的，那么李文普所说的，他听到林彪在汽车上询问伊尔库茨克的有关信息也是假的。这个推理是为了否定林彪外逃的企图。但是，根据前面对林彪去向和离去原因的推理，他问还是没有问伊尔库茨克都不重要，如同李文普是他伤还是自伤一样，对“九一三”事件的性质没有影响。

有人说李文普的行动是为了给林彪夫妇和儿子栽“外逃”的赃，但这种说法绕不过一个巨大的事实障碍：向中央报告林彪一行企图外逃，要求警卫部队阻拦林彪一行离去的是林豆豆而不是李文普，而且是林豆豆报告于前，李文普跳车负伤于后。如果林豆豆听自己的父亲说只是要当晚乘飞机在国内换一个地方（大连）呆着，又何苦向中央告发自己的母亲？李文普又何苦跳出汽车？难道是林豆豆和李文普商量好了演大义灭亲和苦肉计的剧本？

这就是逻辑的力量。

六、关于“叶群、林立果绑架”说不能成立的推论

叶群、林立果绑架林彪，胁迫他外逃，是林豆豆最先认定的，并据此报告了周恩来。

我们不猜“绑架”的手段，因为这个话题很可能导致一部电影剧本的诞生。我们只做逻辑分析：叶群母子要绑架林彪，就要置林彪于无权地位，或者失去行动及语言能力。因为这一家三口的移动要有警卫部队的护送，林彪不发话，叶群、林立果自己走是可能的，但带走林彪是不可能的。欺骗林彪？有这个可能吗？林彪以为去大连，上了飞机却糊里糊涂飞往苏联？还是前面那个问题——林彪若去大连，干嘛不带警卫部队？不带自己的女儿女婿？这一切都是在林彪驻地而不是飞机上发生的事情，林彪干嘛要用这样的手段离开北戴河转往大连？这符合逻辑吗？

“绑架说”可以撇清林彪。只有保住林彪，保住父亲，林豆豆在政治上才有生路。但林豆豆的说法要有事实作为依据。可惜，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支持林彪被绑架被胁迫的事实证据，因此不能采纳。毕竟，林彪在山海关机场自己爬上了飞行员使用的进入机舱的竖梯，这也是公认事实。对一位年过六十的“副统帅”

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动作，头脑不清醒或者自己不情愿，是上不去的。即便是林彪被动地听从了叶群或林立果的建议，那他至少也是一个建议接受者和最终决策者，要负主要责任——从私，他是一家之主；从公，他是副主席。

因此，林豆豆的“绑架说”是一种保住林彪从而保住自己的良好愿望。与《林彪日记》编著者李德、舒云对林彪飞行目的地的怀疑不同，“九一三”事件前半程最关键的参与者林豆豆坚信自己的父亲不是去大连而是外逃，否则，她无须事先发出警报。

这就是逻辑的力量。

林豆豆感知了反常，预知了危险，不愿意林彪离去，但自己又没有能力阻止，所以先提出了将责任推给叶群、林立果的说法，进而又将罪责归于警卫部队及其上级，再在其他人的鼓动配合之下推演为某种有意致林彪于死地的蓄意的“阴谋”。经过这样的三段式推断，林彪、叶群、林立果干了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反正林彪已经成为一个阴谋中的牺牲者，一场悲剧中的英雄。林豆豆的出发点可以理解，也令人同情，但她后来不断操作和“被操作”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不在阻拦一方，而在于出走一方，林彪、叶群、林立果如果不愿意走，谁又能让他们走呢？即使林彪发觉了危险，但采用非常手段连夜飞往大连，对避免危险来说是毫无作用的。这样的强行起飞，岂不是把事情越闹越大，从而使自己更为不利？

据上述推论，林彪不可能为了前往大连而甩开警卫部队和机组人员急匆匆爬上飞机强行起飞，这样反常的离去手段与目的地大连在逻辑上完全无法吻合。因此，《林彪日记》所谓“林彪说去大连，但知不知道去苏联还是一个谜”的说法，没有根据。林彪的最后经历是：9月13日凌晨，林彪夫妇和林立果不顾警卫部队阻拦，在专机机组人员没有到齐，起飞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强行起飞，飞出国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为了保证客观和公认，只说“毁”，而不说如何毁）。

千秋功罪，谁人予以评说？林彪的飞行目的地，谁都可以推理猜测，唯独林彪年谱（名为“日记”）不行，因为它要取信于历史，就只能客观记录而不能主观臆造。

要使本人接受林彪目的地的“谜”说，就要做到以下其中一条：

1. 补充本文所列公认客观事实之外的公认事实，并由此推翻本文的结论；
2. 指出本文所列公认事实的虚假或错误之处，并由此推翻本文的结论；
3. 指出本文所列不予采用的某些内容为公认事实，并由此推翻本文的结论。
4. 指出本文根据所列公认事实进行推理的逻辑错误，并由此推翻本文的结论。

【阅史漫笔】

谁抓了杨勇？

张光渝

按：本篇原载《告别元老》一书。

文革中，红卫兵四面出击，六亲不认。陈凯歌后来就讲出了他批斗自己父亲的事情。我还听煤炭部的人讲过这样一件事，文革初期，在矿业学院附中上学的杨勇的儿子带人到煤炭部刷大字报，“造反”，还要面对面与我父亲“辩论”，要他承认是压制文革的“走资派”。父亲告诉他，我是你父亲的老战友，我是不是走资派，回去问你父亲，比我对你讲更清楚。

后来我又听另一个人讲起了杨勇的儿子，此人是先后在北京市公安局和旅游局工作过的张锋叔叔，战争年代他曾是我父亲的部下：

文革初期我在北京市委工作，住红霞公寓，一大群红卫兵来造反，批斗我，其中还有杨勇的儿子。我心里想，这是什么世道啊！

如此说来，杨勇之子在文革初期可能确有此类行为，且煤炭部与北京市委在一条街上（台基厂），捎带着就一起把反给“造”了，也未可知。我曾在深圳请杨勇的女儿吃过饭，当时不知道有这样一回事，否则问一问她是否如此，也挺有意思。

1967年1月21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在没有宣布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逮捕。现在已知杨勇被捕的背景是：1967年初，江青策划打倒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在京西宾馆开会宣布萧华的“罪状”。但毛泽东却改了主意，声称要保萧华，于是会议半途而止，并决定谁也不能出去讲。不知为什么，参加会议的杨勇回去后却向北京军区传达了。但是这算一个怎样性质的问题，值不值得、应不应该为这样一件事就逮捕一个大军区司令员，为什么在萧华真的被“打倒”后也不放过他，却始终没有答案。

值得指出的是，1939年时，我父亲是鲁西区党委书记，杨勇是鲁西军区司令员，萧华是军区政委兼行署主任。到了1967年1月，我爸爸死了（1月22日），杨勇被捕了（1月21日），7月，萧华最终还是被打倒了。

更需注意的是，毛泽东和林彪当时都表示不知道杨勇的被捕，事后他们还分头询问杨勇为何被捕。而中央文革再横，也不能直接处理一个大军区司令员。我

看到一个毛泽东在 1969 年中共“九大”期间的讲话记录稿，我不能确认它的准确性，只是记录在此作为参考。1969 年 4 月 13 日下午，毛泽东在“九大”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上说：

我看有些干部，将来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群众谅解就是了，有些抓住不放，比如杨勇。当然他也有错误。是哪里下的命令？至今我还不知道。（江青：几个老帅下的命令，叫郑维山执行的。）他们倒打一耙，嫁祸中央文革，我们哪里能下命令抓人呢，至于萧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有问题的，不在其内。

“我们哪里能下令抓人”这句话好像是江青的口气，是不是括号加错了也未可知，但毛泽东说不知道哪里下命令抓杨勇，这个意思却是很明确的。

“九一三”事件后，把文革前期发生的许多不得人心的事情都归罪于林彪。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理由居然是“老同志们”在“二月逆流”中反对林彪。当过李德生秘书的祝庭勋在《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一书中提到：

1972 年 7 月，毛泽东问李德生，你这位北京军区司令员，知道杨勇、廖汉生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毛泽东接着说，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没有经过中央讨论，而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

另有资料证实，毛泽东的那个廖汉生、杨勇被林彪“指使”“整下去”的判断，是 1972 年 7 月 7 日就廖汉生子女的来信给周恩来的批示。杨勇是在当年 5 月复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的。

林彪“指使”的“个别人”是谁？为何林彪垮台之后，仍然无人对“没有经过中央讨论”，连续逮捕大军区政委和司令员的非法行径承担责任？

文革后，原北京军区副政委陈先瑞回忆当时情景，竟仍然不知道究竟是谁下令逮捕杨勇。他说：

杨勇、廖汉生是怎么被打倒、关押起来的，我认为这个问题本来是清楚的。但上面又几次追查是哪方面下的命令，谁把他们抓起来的。3 月，上面追查杨勇被抓的问题，北京军区写了报告，并请示批示，但上面没有批复。对此，我感到很不理解。他们一个是副总长兼军区司令员，一个是国防部副部长兼军区政委，谁敢抓他们呀？如果错了，上面一句话不就放出来了吗？可是，事情却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陈先瑞继续说：

林彪把北京军区副职以上的领导干部集中起来，查问杨勇、廖汉生被抓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抓杨勇、廖汉生是北京军区“大鬼小鬼之间打架”，要求军区领导成员向毛主席写保证书，讲清事情经过。

事情还没完，陈先瑞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两年：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实行对调的会议上说：“杨勇同志是哪个方面下命令抓起来的，我不知道。”

其实，杨勇被关起来后曾两次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信，北京军区一刻也没有压他的信，每次都立即上送，不知毛泽东看到没有。

陈先瑞曾说林彪的“查问”是“推卸责任”，但似乎没有什么证据支持这一说法。而且，既然毛泽东和林彪都来查问，为何在查问后既不说明，也不纠正，不了了之，抓了就抓了呢？林彪倒台已经两年，毛泽东却仍不知道是“哪方面”抓的人，此前也只能把林彪“指使”作为一种“看法”。而江青则在1969年肯定地说是“老帅们”下命令抓人（在1967年初的环境下，能下命令的“老帅们”是特指徐向前、叶剑英等人，不包括“林副统帅”），郑维山执行。但是如果老帅们抓人，江青知道毛泽东能不知道？

文革中许多高级干部蒙冤入狱，但毛泽东在一个人入狱之后至少三次查问，反复表示自己不知情的，杨勇似乎是唯一一位。

上世纪八十年代徐向前元帅写回忆录，也讲到了杨勇被捕事件：

叶剑英同志忽然告诉我说：杨勇可能保不住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上峰的意思，对杨勇要“烧而焦”！我猜想，这位“上峰”大概是林彪。因为我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工作，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还说：杨勇反彭黄不积极。……杨勇同志传达批判萧华的会议内容，恰好给林彪以收拾他的借口。

徐帅说下令抓杨勇的人是林彪，用的是一个“猜”字，这里只明确了杨勇倒台之前徐、叶是知道的，而且身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是由叶剑英用口头打招呼的方式告知的，到了写回忆录的时候仍然在“猜想”是哪个“上峰”决定逮捕杨勇。问题是，林彪专案审查了那么多年，杨勇被抓与林彪有何关系，为什

么元帅还用“猜想”？

至此，这件公案仍无结论。读者感兴趣，可以继续“猜想”下去。

但无论如何，那个时候杨勇的儿子已经顾不上批斗别人，他的任务是打探消息，想弄清自己的父亲被搞到哪里去了。

现在大家都已看到，文革本身就是大水乱冲龙王庙。但这又是何苦呢？

我参加了当年的大串联。1966年9月，我从武汉给爸爸妈妈写信，“汇报”我在外面“革命”的情况。我说正参加首都红卫兵和武汉红卫兵的联合行动，要求王任重承认“路线错误”，批判湖北省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是很得意的，以为爸爸妈妈也很赞赏我的行为。但他们没有回信，几十年后找到爸爸1966年12月在黑龙江疗养地写给我们四个子女的信，其中只字未提“革命造反”，而是希望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

本文参考、摘录的书目或文字资料

《李德生在动乱岁月》 祝庭勋 中央文献出版社

《廖汉生、杨勇被抓和“华北山头主义问题”》 陈先瑞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阅史漫笔】

从郑维山的起落看毛泽东的“保”与“不保”

——读《一代名将郑维山》

张光渝

按：本篇原载《读书鉴史：解读周恩来》一书。

“保”

1967年1月，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和司令员杨勇相继被抓走，郑维山被指定为代理司令员，并任北京军区党委书记，在一个不适当的时机当了一个不适当的一把手。

1968年3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揪”出来，罪名之一是杨成武搞“华北山头主义”，没有指明的“山头”后台是聂荣臻。而郑维山在历史上也属“华北山头”，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江青说郑维山为镇压造反派而向中央文革要“扫荡权和开枪权”。林彪则宣布杨成武山头要搞掉与之资历差不多的杨得

志、许世友等人。

看来，郑维山的政治生命已经岌岌可危。北京军区为批判郑维山和“华北山头主义”的第十二次党委会竟然开了一个多月还没有结束。但是，毛泽东却出面“保”郑维山了。

1968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责问：“为什么北京军区的会开得这么长？为什么抓住郑维山不放？”（《一代名将郑维山》，董保存、范占英著，人民出版社出版，280页）

文革中，毛泽东不时会发出口头或书面的“最高指示”，保护一些干部。但是在保护郑维山过关的事情上，毛却一反高屋建瓴，大而化之的常态，变得格外精心格外细致。

毛泽东的“五一”表态使郑维山没有被马上打倒，但检讨是少不了的，他被派到军区各个部队去做检查，听取批评和批判。1968年6月初，毛泽东先后两次接见了军队驻京干部，郑维山都没有能参加。第三次接见原定6月10日，但毛泽东指示：“一定要等维山同志回来。”（同上282页）

为等一个正在到处检查错误的干部而改变自己的日程，不能不说毛泽东是另有深意的。按说在文革那样的局面下，如果不是毛泽东力保，十个郑维山也倒台了。但恰恰是这个原因，反而使毛泽东觉得应当保留这个“山头”。旁证是当聂荣臻在“杨余傅”事件后因自己被攻击为杨成武的“黑后台”而向毛泽东讨说法时，亲自决定打倒杨成武的毛泽东却说，杨成武的第一个后台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清一色”是毛泽东很忌讳的局面，就算是当时他还对林彪没有什么负面的评价。与其说毛当时在防范谁，不如说这是他一贯的用人之道。

第三次接见真的是在郑维山回京后安排的。接见之前，在人民大会堂休息室里，毛泽东要黄永胜出去看一下郑维山到了没有。

黄永胜出去看到了郑维山，回去报告毛主席：“郑维山到了。”

毛泽东不放心，对谢富治说：“再去看看郑维山，并且要同他握个手，看他到了没有。”

谢富治同郑维山打了招呼并握了手，回去跟毛泽东说：“到了。”

毛泽东仍不罢休，再叫来汪东兴去看，汪东兴第三次报告：“主席，郑维山确实到了。”此时，毛泽东方才开始接见活动。

接见过程中，毛泽东又特意从人群中拉出郑维山与他单独合影，这真使郑维山受宠若惊，感激不尽。毛泽东还握着郑维山的手说：“上两次接见你没有参加，就出了不少谣言，这一次你再不到，人家就要打倒你了。”（同上283页）

郑维山想没想过那个“人家”是指谁？但郑维山肯定知道，毛泽东这样的

出格举动是为了保自己过关，他还坚信伟大领袖绝对信任自己的忠诚。实际上，毛泽东那样做，是给别人看的，他另待郑维山，也决不是因为他特别信任郑维山。

“不保”

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郑维山是华北组三位副组长之一（另两位是吴德和解学恭），组长是李雪峰。倒霉的是，华北组在陈伯达和汪东兴的煽动下成为拥护林彪讲话最积极，“抓坏人”最卖力的一个组，该组的会议“第六号简报”成为最重要的“反党罪证”。郑维山与华北组的多数成员都陷了进去。

毛泽东当时的策略是，先打陈伯达，再及林彪。打陈伯达的突破口在哪里呢？从陈伯达与北京军区的关系开始。

1968年到1969年，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和内蒙古都处于严重的派性冲突之中，其根源是接管地方党政大权的军队内部有矛盾，野战军与省军区观点不同，支持不同派别的造反组织。郑维山以军区司令的身份多次开会协调，都无功而返。郑维山在1967年毛泽东南巡的列车上还专门向毛泽东汇报了这种情况，毛对此也很忧虑，但并没有怪罪郑维山，而是表示河北那些被打倒的地方干部将来要“大翻身”。（同上 304—305 页）

但是，现在需要一个突破口，需要把陈伯达与林彪联系起来，就要先把陈伯达与军队联系起来。于是，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一份署名北京军区下辖的三十八军的报告上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开长会、大会讨论“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的太上皇”，把北京军区，也就把郑维山当“石头”甩了出来。

1968年，毛泽东曾责难北京军区党委会开得太长了，这次，毛泽东却明确表示北京军区党委要开长会、大会，要讨论陈伯达为什么成了北京军区的“太上皇”，也就是说，谁擅自将军权交给陈伯达。这是一个天大的帽子，而要戴这个大帽子的第一人，就是他两年多前费尽心思保护的郑维山。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那段时间受命解决华北问题。他到河北、到内蒙处理这些事情，不和军队打交道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带上郑维山是完全必要的，郑维山也是不能不跟着走的。这一切，毛泽东其实很明白，如同他明白聂荣臻那个“华北山头”究竟是怎么回事一样。正如文革结束后为郑维山平反的正式文件中指出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陈伯达被任命为中央文革组长，分管华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并要北京军区有关‘三支两军’的问题向他请示，这是历史事实，不存在北京军区和郑维山同志把他‘捧为太上皇’的问题。至于两次陪陈伯达‘周游’

华北问题，郑维山同志是奉命行事的，而且事后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了报告，根本不存在‘背着中央’的问题。”（同上 385—386 页）

简单的逻辑和事实，在复杂的特殊环境下会被忽略，或视而不见。后来，1971 年 1 月，原定要开的北京军区党委会变成了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华北会议。会议只要一沾上“华北”两个字，郑维山就要倒霉了，虽然他在战争年代为华北的解放尽心尽力，屡立战功。奇怪的是，毛泽东为了彻底搬掉郑维山，还责备说：由于郑维山等人的干扰，“林副主席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同上 346 页）

毛泽东两年前为了与林彪山头搞平衡，保了郑维山。现在，为了最终平掉林彪山头，他要先牺牲郑维山了。把陈伯达、郑维山一起拿下后，北京军区不给林彪的人马，而是委任李德生为司令员。后来为了搞新的平衡，毛又遣走刚当了两年多军区司令的李德生，连李的第十届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都一起免掉，这是后话了。

从 1971 年 5 月起，郑维山被剥夺权力靠边受审，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这位毛泽东认定搞得林彪“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的郑维山，竟又成了“林彪死党”。

因为与林彪案的牵连，郑维山的平反迟到 1978 年，正式发文彻底平反是在 1980 年 10 月。这份专门为郑维山平反的总政治部文件传达到北京军区全体干部和党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如下：

“所谓‘紧跟陈伯达在庐山反党问题’。1970 年 8 月 24 日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煽风点火，汪东兴同志随后做了言辞更为激烈的发言，并代表八三四一部队要求新宪法写上设国家主席一章。在这种情况下，郑维山同志表态支持‘设国家主席’是错误的，但 27 日郑就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信做了检讨，并如实反映了陈、汪在华北组发言的情况，此信现存中央办公厅。郑当时的表态，是属于上当受骗。”（同上 386 页）

很明显，根据这份平反文件看，汪东兴是和陈伯达一样的施骗者。但九届二中全会后汪东兴却安然无恙，继续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而郑维山等许多认定汪东兴“是主席身边的人”的上当者却被打倒。

可见，毛泽东保谁，不保谁，是从“革命大局”的需要出发的，绝不是从与谁有什么交情出发的。

【阅史漫笔】

将军在黎明前死去——赵尔陆

张光渝

按：本篇原载《告别元老》一书。

1967年2月2日，上午9时许，国防工办的机关工作人员见赵尔陆早上一直没出来，就轻轻地推开赵尔陆办公室的门，吃惊地发现，他坐在平时加班休息用的小床上，身体向前倾，头垂在膝盖上，手里夹着一支香烟，燃烧的香烟把手指烧得焦黄，可是他再也感觉不到疼痛了。一代名将就这样默默地告别了人世。

正当人们为赵尔陆的去世而悲痛的时候，国防工业办公室秘书室接到了周恩来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周总理让赵尔陆立即去中南海休息。这是周恩来对赵尔陆采取的具体保护措施。可惜，周总理万万没有想到，几个小时之前赵尔陆已经和他永别了。

这是一位名叫马京生的作者在《党史纵横》2005年第二期上为纪念赵尔陆诞辰一百周年发表的文章《共和国国防工业第一任部长》中的一段内容。1967年2月全国夺权高潮时期，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困在办公楼内有家不能回，于2日黎明前突发疾病无人救治而死。他是那个疯狂时期继张霖之以后十一天内第二个死于非命的国务院正部级干部，而赵尔陆和张霖之又同是第二机械工业部（最初的国防工业部）的创始人。

赵尔陆是新中国国防工业的奠基人之一，1952年从中南军区第二参谋长任上调到北京当新设立的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与此同时，我父亲从重庆调到北京任二机部副部长，开始与赵尔陆搭档。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同时又面临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陆海空三军所有武器装备的研究、制造，责任重大，工作艰巨。我父亲1955年1月离开二机部。后来几经变动，随着国防工业的不断发展，国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逐步形成了总共八个机械工业部的民用军用工业体系，其中一机部主管通用机械，八机部主管农业机械，除此之外的各机械工业部都以军事工业为主，即：二机部是原子能工业部；三机部是航空工业部；四机部是无线电工业部；五机部是兵器工业部；六机部是舰船工业部，七机部是导弹工业部。虽然它们的业务中也有民用部分，如无线电和民用船只建造，但主要任务是生产军工产品。从“二机”到“七机”，都是从最早的那个赵尔陆任部长的二机部延承发展起来的。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赵尔陆和我父亲的观点基本相同，都认为彭德怀不是反党。他们私下议论的观点是——

赵尔陆说：“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反党干什么？”

我爸爸说：“反党？老婆孩子怎么办？”

看来两人的“路线斗争觉悟”都不高。不同的是赵尔陆表态过早，彭德怀的信刚一公布，他就说“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于是在庐山会议后挨了整，一路检讨下来，总算过关。

1961年，赵尔陆被任命为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协助兼任主任的总参谋长罗瑞卿继续主管国防工业。为了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赵尔陆在西北高原带病坚持工作。1964年6月，他主持上报了在年内可以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报告，周恩来经毛泽东批准，将首爆时间定为1964年10月16日。后来毛泽东曾拿着原子弹爆炸的照片向赵尔陆详细询问有关情况，并对他说：“你现在也是内行了！”

赵尔陆是“井冈山”系统的人，算得上毛泽东的嫡系，并且还救过毛泽东的命：1948年在河北阜平城南庄，敌机突然临空，毛泽东刚刚睡下，不肯离开房间。此时，聂荣臻、赵尔陆和毛泽东的卫士长等人跑过来催主席快走。毛泽东的脾气，越是这样他越不走，幸好聂荣臻的秘书范济生搬来了行军床，众人不分三七二十一将毛泽东抬上床就往外冲。既然已经出来了，毛泽东也就没有执拗的必要，下来自己走。刚到防空洞门口，炸弹就落下来了。

1948年5月，中央将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赵尔陆任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聂赵“救驾”有功，毛泽东是记得的。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文革前在国防科委工作，是赵的部下。李敏的生母贺子珍在上海，李敏常要请假去看望，得到了赵尔陆等老同志的关照，他们在井冈山时期就是贺子珍的战友，当然对此开放绿灯。李敏为此还到赵尔陆家中表示感谢。

文革初期，赵尔陆被批斗，困在办公室身亡，李敏觉得事情不对，就到中南海去找父亲反映情况，毛泽东听说赵尔陆被迫害致死，发了火，李敏的女儿孔东梅后来的说法是：

妈妈吓坏了，她第一次见到外公（指毛泽东）对自己发火，那么大脾气，外公暴怒了：“赵尔陆是上过井冈山的人，他是革命好同志，是谁决定要批斗他？”外公问。

还好，外公的雷霆之怒不是冲妈妈来的，这是妈妈1949年来到外公身边后，看到他发的最大一次脾气。外公从来没有对妈妈发过脾气。

毛泽东的亲人大概认为毛发动文革是出于好心，如果大家都照毛泽东的话做，文革本来是不会有那么大损失的。但是我可以肯定，不是谁被批斗而死，毛泽东都要发那么大火，比如张霖之。我的遗憾是，迄今不知道毛主席对我父亲

之死有何表态。请注意，毛泽东发火时间“是谁决定要批斗他？”也就是说，不要讲整死，就是批斗赵尔陆都不行，是谁大胆“决定”的？进一步讲，斗谁不斗谁都是“决定”的，所谓“群众运动”不过是个幌子而已——我不直接打倒你，而是借“亿万革命群众”的手来打倒你。可悲的是，今天竟然还有人在宣称文革是“真正的大民主”。与按谁有多少土地来划分地主不一样，文革的“革命对象”“走资派”是“决定”出来的，这是文革荒谬性的根源。

孔东梅接着说：

外公为保护井冈山的老战友赵尔陆而大动肝火，足见井冈山人在他心中的位置。包括外婆、舅公在内井冈山时期老干部大多数活过了文革十年。陈毅去世时外公还突然出席了追悼会，这不是偶然的。

按这个说法，那应当是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功德”，只是不知道如果另一位“井冈山老战友”林彪没有变成“野心家卖国贼”，毛泽东会不会去参加早年“老对头”陈毅的追悼会。而且，据孔东梅的叙述，赵尔陆在毛泽东“大动肝火”时已经死去，“保护”也晚了。

赵尔陆在文革初期被冲击，是因为他在国防工办是罗瑞卿的副手，历史上两个人也合作过，此时井冈山的招牌是不管用的。毛泽东亲自将罗瑞卿打倒，发动群众整“走资派”，没想到会殃及“池鱼”赵尔陆。1967年初，军委将赵尔陆招到西山保护起来，但好景不长，1967年1月22日，聂荣臻、叶剑英“同意”赵尔陆回国防工办上班，“争取早点儿取得群众谅解”。当天晚上，赵尔陆在西山驻地与夫人女儿一起吃完饭，于深夜乘车回到国防工办的工作岗位。——这一天，正是我父亲被害身亡的日子。

从这一天起，赵尔陆也再没有见到自己的家人。他被造反派困在办公楼内，十几天之后的深夜，在停了暖气的办公室里，他因哮喘病突发无人救治而亡。

赵尔陆死了，造反派却不愿意放弃手中的这个斗争目标。“有枪就是草头王”，那时候的造反者认为，谁“抓”的走资派官大，谁才可能在未来的权力分配中得利，所以他们还要从赵尔陆的死因上继续做文章，污蔑他是“畏罪自杀”。最后是周恩来总理出面对造反派说：“赵尔陆同志是正常死亡，你们不要抓住不放。”随后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等领导人出席了赵尔陆的追悼会。

网上有人评价马京生纪念赵尔陆的文章，“射天狼”如此认为：

这篇文章没将赵尔陆死的原因归结为林彪，看来也实在找不出林彪有迫害赵的证据。赵原本是林四野的参谋长，与林关系密切，文革初也受到林的保护。可

现在的文章只说赵受到聂荣臻叶剑英的保护，绝口不提林彪的作用。且所有这些文章都绝口不提赵是奉了谁的命令被迫从军委指挥所的西山下山接受造反派的批斗，以致赵心脏病发作去世。看来国内的史家们在写作时多少也有了一些良知，但却离历史的真相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啊。

孔东梅说，毛泽东听到赵尔陆已死的时候发的火气“不是冲着妈妈来的”，那是冲着谁去的呢？她没说。按一般人的惯性思维，那是冲着“林彪、‘四人帮’”去的。也许是我的孤陋寡闻，我至今没有听说毛泽东的后人对毛发动的文革做出反思，表达歉意，反而刘少奇的家人公开承认刘对形成党内个人崇拜的政治局面负有责任。

将军在黎明前死去。他虽然是忠心耿耿于国有功的井冈山嫡系，毛泽东为他的死还少等地发了脾气（按孔东梅的话说是“最大的一次脾气”），但如果赵尔陆侥幸活到黎明并且进入中南海避难而逃过此劫，他肯定还是不会赞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点，孔东梅想到了吗？

本文参考、摘录的书目和文字资料：

《共和国国防工业第一任部长》 马京生 《党史纵览》 2005 年第 2 期

《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 聂力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 孔东梅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风云人物】

文革中的张爱萍

——兼谈《从战争中走来》的写作尺度

张光渝

张胜曾任总参战役局长，是开国上将张爱萍的儿子。1993 年，当他已确定升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的时候，却写了辞职报告，称按军官服役条例，自己已入伍三十年，申请退出现役。父亲对不解的有关领导说，“随他去吧！”对儿子发问：“你不会饿饭吧？”

张胜写了一本书《从战争中走来》（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年 1 月出版），记录张爱萍的一生历程。这本书写了很长时间。我认为，这是我看到的开国元勋后代写前辈的同类作品中最好的一部。

首先是因为张爱萍可写的事很多；其次是张爱萍、张胜父子做过认真的对话，

这是绝大多数同类家庭中没有的；最后，更重要的，是作者张胜对文章尺度的精妙把握，使得此书成为在国内公开出版而言辞、内容最接近底线甚至略有突破的精品。能有这样的成功，当然是因为张胜手中“有料”，而有料的原因之一是他曾为写父亲传记得到了迟浩田特批的一年假期，再加上他的所谓“太子党”身份，绿灯长亮，这都是其他作者很难具有的便利条件。还有，战役局长的职务，也使张胜在与前辈老军人的对话中能更加敏锐地捕捉到问题的关键和事件的精华所在。当然，更为关键的是，它获准出版了。

以下关于张爱萍在文革中的经历，均出自《从战争中走来》，特截取这段内容来展现张爱萍的事迹和张胜的尺度。

惑问

1964年10月，张爱萍作为总指挥完成了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光荣任务，但诡异的政治历史却中断了他的事业，改为到苏北地区搞“四清”。张爱萍从毛泽东“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观点出发，认定农村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源于贫穷和愚昧导致的麻木。这虽然与阶级斗争为纲有些背离，但张采取了大讲“老三篇”，把党的政策和主席语录编成小册子发给农民的办法，一面学文化，一面学政策、学理论，那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三字经》。张爱萍的做法受到了在附近蹲点的叶群的注意，因而获得了向林彪汇报四清工作的殊荣。这一天是1965年11月23日，林彪住在苏州，正在最后策划着打倒张爱萍顶头上司罗瑞卿的行动。

林彪充分肯定了张爱萍的经验，他说：“毛主席的思想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是最高的，影响是最大的，是推动四清运动的最好武器。这样不仅有了四清的办法，还有了道路，有了方向。”（293页）此时，张爱萍的想法和林彪是一致的。张爱萍的四清经验被登在《人民日报》上，向全国介绍。张爱萍曾在一次四清工作会议上说了三句话：第一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第二句，这是毛主席说的；第三句，四清就按这个办。当时党中央陆续制定下发的什么“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张爱萍一条也没说。（281页）显然，张爱萍的经验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大相径庭。

当然，张爱萍怎么也想不到，两年之后，他会被当成“特务”、“假党员”投入监狱。其实，那关键的转折就在半个月之后，1965年12月，张爱萍被召到上海，参加揭发批判罗瑞卿的会议。张爱萍的思想完全没有准备，会场上也是一片沉寂。此时陈毅开腔：“爱萍，你在总参工作，总长出了问题，你这个副总长应该清楚嘛。你就先给大家说说吧！”老上级不经意间将老下级推向了悬崖边。张

爱萍只好说：“我不清楚叶群同志讲的这些情况。给我的感觉，林总对罗长子是很信任、很放手的，罗也总说哪件事哪件事都是林总同意的。谁会晓得出这种事，我是第一次听到。”

这样的发言，还不如不发言。张爱萍对张胜说：“当时我既没有看到倒罗的实质，也没有意识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我只是从思想上、作风上提醒自己，在成绩和功劳面前不能向党伸手，告诫自己，不要走到罗的道路上去。我从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方面做了自我批评性的发言。”（300 页）

此时别人的表现怎样呢？张胜写道：“从故纸堆里，我找到了当年作为会议文件下发的某领导人的一份发言，从中可以品味出当时的气氛。这个平时和罗工作关系最紧密的人说……”

张胜的妙处就在于此，他自始至终没有把这个“某领导人”的名字写出来，但读着读着，读者就会清楚无误地知道他是谁。我记得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过一文，其中揭露了一位将军的恶行，她同样没有指名，但却用了“姓陈”的“高级将领”一词，把众多陈姓老将军划入了嫌疑之中，此法极不可取。

“某领导人”这样说：“罗瑞卿的问题我早有察觉。到了 1965 年，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的活动就更疯狂了，公开跳出来，反对林副主席，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他就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他就大骂林副主席。”他还“揭发”：罗瑞卿“是一个最喜欢最善于伪装、造谣、挑拨、抵赖的人”、“罗瑞卿的错误，是篡军反党的错误，是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罪行！”

晚年张爱萍说：“我还是固守我的老原则，实事求是……我从心里鄙视那些政治投机者，都是些无耻小人！”（301 页）

据我所知，国内公开出版物不点名地将一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可耻言行公之于众，《从战争中走来》即使不是首例，也是最透彻、最少掩饰的。

除罗（瑞卿）之外，杨（尚昆）、陆（定一）、彭（真）也相继倒台，张爱萍又要“表态”。从大西北核试验场回到北京的他张口就说：“对中央的决定我没有异议，但我就是看不惯有那么一批投机分子，人家在台上的时候拼命巴结，出了问题就落井下石，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共产党内搞成这种风气了！”（302 页）那种时候说这种话，纯粹是自己往监狱里钻。周恩来收到了状告张爱萍大逆不道的信件，和陈毅一起召见他，要他谨慎小心。张爱萍回忆：“总理有事要走，临走出门又转回来，又叮嘱我一遍，并指着陈老总说，还有你！你们两个都要管住自己的那张嘴！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可不要乱讲话啦！切记！切记！”（303 页）

蒙难

“切记”也晚了，总参和国防科委陆续掀起了“批张”狂潮，重点就是张爱萍上述的那句话。张胜尽力寻找谁是批张的主要推动者。从1966年9月起，总参就开始有计划有领导地部署批张、倒张的行动，有一系列文字批示为证。1967年3月8日，张爱萍做出检查：“我拥护总参党委把我作为批判对象的决定。同志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促使我重新认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改造世界观，保持革命晚节。”张爱萍表态支持打倒彭罗陆杨，拥护本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309页）

也就在同一天，总参将编辑好的《张爱萍反党言行》一式两份呈报叶群，请她一份给林，一份给毛。3月9日，林办接到了总参电话，询问上级对昨天报送的材料有什么精神，并催促尽快解除张爱萍的职务。张胜在这里写道：“又是他，迫不及待了”。（310页）

1967年3月29日，总参上报《建议成立张爱萍问题专案组》，毛泽东批示：“照办”（没有注明时间）。张爱萍终于因言获罪。同年12月1日，张爱萍专案组上报《建议将张爱萍隔离审查的报告》，毛、林圈阅，12月26日，张爱萍被正式逮捕。他被关在一个不知何地的潮湿小黑屋中，收去裤腰带，走路要提着裤子，大小便要报告获得允许，憋不住时就解在裤子里。斗罗瑞卿时，张爱萍在场陪斗，他回忆：罗瑞卿“是用箩筐抬上来的，一个人上去就打他耳光，把他打趴在地上，绷带撒了一地，他拖着一条断腿在地上爬。”（313页）

国内出版物，重提那段令整个中华民族蒙羞的历史细节，已经非常非常罕见了，一切都在“宜粗不宜细”的借口下化为虚无。要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依然敢于将这段真正的国耻铭记在白纸黑字之中。但恕我直言，如果是一本记录平民百姓或者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右派分子的文革受难史，有人给出版吗？

张爱萍曾对孩子们说：“在我戎马生涯中只打过一次败仗，中了敌人的埋伏，毛泽东知道了，还鼓励我说，哪里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你们都知道的一首歌，我把党来比母亲。我实在想不通，在战争年代，打了败仗，尚可原谅，而今天，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地呢？”（313页）

但在我看来，根据另一套逻辑，这个疑问似乎不成立。毛主席早就说了：“一个不杀”。你要死，是你自己的问题，与你比作“母亲”的党没啥关系，与毛泽东更无关。死不死看你的造化如何，谁“置你死地”了？彭德怀、贺龙、陶铸，不都是自己死的吗？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特务”，不是也没杀嘛！还要怎样！？更何况，毛主席早就明言要共产党员“不怕坐（共产党的）牢”，“不怕（被共产党）杀头”，如之奈何？

为了彻底打倒张爱萍，专案组通过一系列目标明确的逼供信，给张爱萍安上“假党员”、“日本特务”、“为敌人提供情报”等等罪名。1968年1月7日，那

位“某领导人”写报告给林彪：“林副主席，并中央：在铁的事实面前，张爱萍自己供认他1926年入团和1928年入党是编造的。他不是团员，也不是党员，是在1930年来到闽西时混入党内的。即呈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富治、叶群、东兴同志阅示。”签名者是“他”和吴法宪（322页）。既然介绍他入党的人都被迫承认自己不是党员，让张爱萍如何为自己辩护？既然为张爱萍医治枪伤的人被迫承认自己是日本特务，他又如何解释为什么要让特务为自己疗伤？张胜说：“在文革后退回的卷宗里，我看到了当时魏传统、王维舟、胡耀邦为确认张爱萍是共产党员提供的证词。但他们居然敢压下来！”（322页）“他们”，包括了“他”在内。

在正式上报张爱萍是“假党员”的前一两天，“他”电话指示专案组：“对张爱萍的问题应当明确是个特务问题”，“张爱萍的审讯要一下能突进去”，让他“跑不了”（323页）。把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总指挥“明确”为“特务”，究竟是何逻辑？究竟出于何种心理？那些身经百战、同甘共苦的当年战友和上级，为什么会认可天下有如此“昂贵”的特务？他连原子弹都不破坏，还想破坏什么？？？

张爱萍面临的是轮番批斗和提审，但事情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1968年3月5日，“总部领导人”向总参党委和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写出报告：“张爱萍的日本特务分子问题基本可以定案。”张胜特意写道：“命不该绝。19天后，总部那位负责人突然被逮捕。据说，去现场逮捕他的就是和他一起签名上报对我父亲关押的吴法宪和那个专案组长。”（324—325页）如果读到这里竟然还不知道那位“负责人”或“总部领导人”是谁，那就太遗憾了。但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张胜在书中就是不说他的名字！

文革结束后，张爱萍依然念念不忘那些人的恶行。他不赞同把一切都归于体制的说法，他认为关键是人品。在纪念刘少奇的座谈会上，张爱萍激愤地发言：“有些人，在文革中坏事做绝，又毫无悔改之意，到现在还在写文章为自己涂脂抹粉，到处招摇撞骗！”在场的方毅喝彩：“爱萍同志讲得好，就是要这样讲！大声地讲！公开地讲！”（329页）

“他”被打倒了，张爱萍能出头了吗？否。专案组换了人，从此再无人理睬他，将他关在暗室，任其自生自灭。张胜写道：“这种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折磨政敌的方式，想起来就叫人毛骨悚然。毛泽东说过，党内斗争，我们一个不杀。这或许是一种进步。囚于斗室，无人对话，无人问津，精神和肉体在无声无息的黑暗中被慢慢吞噬，生命之火渐渐地燃尽。

“生和死，其实只是时空的转换。无怪林彪即使摔死，也要出逃，因为他知道，那时，他将生不如死。”（331—332页）

张胜的这个写作尺度可是顶到头了。

此时的张爱萍，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好在他及时调整了心绪，集中精力背诗、做诗，都一一记在心里。李锐也是凭借诗词熬过多年独自监禁的。出狱后，他们两人又不约而同地出了诗集，那也算文革的“丰硕成果”之一吧。

彻悟

张爱萍在狱中，对自己的遭遇百思不得其解，苦闷至极。让他豁然开朗的是中共“九大”会议公报，他认真点验选入政治局（含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二十四个人，其中林派六个；江派六个（张爱萍把谢富治划入江派）。其他十二人，除毛泽东外，张胜这样写：“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文革中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典型纪登奎；三支两军的代表李德生；三个党内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刘伯承双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历次党代会都是政治局委员的；有的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张胜不写了，他笔锋一转，写道：“真正有治国治军才干的，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在党内军内享有威望的，同时身体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父亲说：‘我终于恍然大悟了。’”（335—336 页）

这个评点肯定只代表张爱萍父子两人的观点，但这种评点方式也算很独特的。张胜对多数人又评又点，对剩下的几个人却只评不点（名），谁有心谁去找，谁想对号谁去对。原来，没有被张胜点出姓名的“九大”政治局委员，只剩下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三人。读者可以推断，那个“历次党代会都是政治局委员”的人是李先念，不过这个“历次党代会”要从八大算起。剩下的许世友、陈锡联两人，许世友更像是只识“大字”的人，于是陈锡联就变成了省略号。其实张爱萍对陈锡联的印象比对许世友好。张胜的书中没这么说，但可以看出来。国内发行的书籍中如此评点高层政坛人士，可谓独一份。

不过张爱萍当时的结论十分到位：“这是个宗派集团。非常典型的党内宗派集团。林彪、江青的党内宗派集团！”（336 页）因此：“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也不仅仅是有人想报复我，整死我，是党出问题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340 页）从此，张爱萍再也不想自己的生死荣辱，他关心的是国家的前途，党的命运。

张爱萍真诚地拥戴过毛泽东，因为他是领导中国革命战争不断走向胜利的领袖。但张爱萍从不像一些老同志那样无条件地崇拜毛泽东。狱中的张爱萍打定主意：“如果党坚持错误，丢掉、背弃自己的宗旨和信仰，那就不是我要加入的党，也不是我要革命的目的。我可以走！”（344 页）许多老同志做过许多“反思”和表白，文革中被委屈，被冤枉时，他们往往只能表示一种无条件的忠诚，寄希望

于党能够相信自己，恢复自己的清白。即使党犯了错误，只要为我平反，给我职务，我仍然要鞠躬尽瘁，听党的话，跟党走！张爱萍决然不同。如果党依然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样子，“九大”那个样子，对不起，我张爱萍可以离开！这才是一个真正忠诚的革命战士！

从此，张爱萍再不写一个字的交待，再不写一个字的申辩和请求宽恕的文字，“我保持自己做人的准则。”（334 页）张爱萍的愿望是，如果能够活着出狱，他就带着全家到当年长征路上云贵边界一个叫关岭的山区去，开一个照相馆谋生，从此不再干那个所谓的“继续革命”！张胜赞叹：“大彻大悟。只有经历了炼狱的人，才可能获得如此的彻悟。”（345 页）

林彪倒台，王震帮助了张爱萍的家人，将申诉信交给了周总理。王震策略地要求张爱萍的儿子为老子写个检查，“给老人家（毛泽东）一个台阶下”。因此，张爱萍得以出狱的检查报告是别人为他写的。周恩来批准张爱萍外出治病，又于 1972 年 11 月解除监护。张胜说：“宣读了父亲被解除监护的通知后，有人提醒他是否应该对中央的决定表示个态度。父亲说：‘强盗把你抓进去再放出来，你还去感谢强盗吗？’

“对他，看来五年的关押还不够。”（347—349 页）

知父莫若子。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令将林立果等人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转发全国，作为“大批判”的靶子，却引发人们复杂的联想。张胜将其中“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原话大段抄录在《从战争中走来》的书中，并且写道：“我们设法把文件摘抄下来，带到医院，读给尚未解除监护的父亲听，他说：‘林彪的死，是对毛泽东最大的警告！’”（351 页）

亮剑

1975 年 3 月，经过叶帅的反复动员，张爱萍重披战袍，作为“还乡团”杀回了科委系统，重点整顿 230 厂。他比以前更猛，更无所顾忌，因为他不再有文革初期的“戴罪”心理。他对孩子们说：“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主席回心转意了。”这是他出山的前提。（358 页）

张爱萍判断错了。毛泽东没有回心转意，他的话是：“翻案不得人心。”1975 年 11 月 2 日，被张爱萍赶出七机部的著名造反派首领舒龙山揭发张爱萍的告状信递到了毛泽东案头。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 9·16 左派。”（380 页）

“酌处”？总政“酌处”得了吗？华国锋出面主持，纪登奎、李先念、陈锡

联召见张爱萍，传达“懿旨”，观察态度，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笏奉陪末座，唯独没有总政的负责人。以下是张胜抄录的当时的会议记录：

李先念：看完了？怎么样？

张爱萍：不怎么样！

李先念：什么？连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怎么样吗？

张爱萍：不怎么样，就是不怎么样！

沉默……

纪登奎：我问你，“今不如昔”这句话是什么人说的？

张爱萍：是右派说的。

纪登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爱萍：还用解释吗？告状的人不是左派吗？

纪登奎：那你到底说了没有？

张爱萍：还用我说吗？七机部的问题你不清楚？

纪登奎：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一大摞！

张爱萍：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

纪登奎：你什么意思？

张爱萍：“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记了？

纪登奎：你血口喷人！态度很不老实！

又是沉默，又是问话，又是毫无顾忌地回击。张爱萍把自己在狱中的所思所得完全发泄在这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之中，毫无惧色，几位手捧“圣旨”的“钦差”竟然被张爱萍一个人顶得手足无措。

李先念：你说拿出能打到莫斯科的武器，什么意思嘛！

张爱萍：什么意思？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化嘛！你们不是老在喊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吗？

老实人陈锡联用腿碰碰张爱萍，悄声说：“你承认了算了。”说实话，这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老干部在那种情况下会选择的态度，但“大彻大悟”的张爱萍不在此列，他不买陈锡联的账，大声问：“你们要我承认什么？”

陈锡联：“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嘛！”

张爱萍大吼：“那是你！”

主持人华国锋觉得会议开不下去了，宣布：“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张爱萍事后说：“华国锋替我解了围。”（379—381页）实际上，也是让那几

个人一起下台阶。

真是非凡的精彩。不过，要不是张胜找到这个会议记录，要不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大胆地交付排印，放到书店里，我们到哪里去看这样精彩的对白？有些话，是不是连某些论坛的版主都要下意识地删除？

张胜记录了他父亲对那几个人的评价：

“后来有人告诉我，李先念在毛泽东面前还是为我开脱过的。不过，当时对他是很有看法的。在汇报七机部问题时，他也是一起参加的嘛。”

“陈锡联是希望我快些过关，他是好心。”

“华国锋同志是个很厚道的人，我一直很感激他。对他是不公道的。”（381页）

如此对华国锋表态，提到“不公道”一词，国内公开出版物应是首次。张胜的尺度有所突破。

张爱萍解释他当时的激愤心态：“只是有些人品格太差，还坐在这样高的位置。”（381页）纪登奎的儿子曾写文章为父亲叫屈。其实，文革结束了，纪登奎下不来，站得住吗？

1975年12月3日，邓小平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邓向毛泽东表示，张爱萍到七机部“是我派去的。”他也许觉得，这是为张爱萍承揽责任的最后机会了。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对这位当时只能“管外事”的老助手说：“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对爱萍还是要帮嘛！”张爱萍对“1975年的邓小平”十分敬佩。（385页）

不过，张爱萍从来不把自己划成“某某某”的人。1975年，邓小平推行整顿工作的高潮时期，张爱萍与科学院的胡耀邦、铁道部的万里、教育部的周荣鑫被并称为“邓小平的四大金刚”。令人意外的是，张爱萍却并不以此为荣，他忿忿地说：“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396—397页）这就是张爱萍的政治立场。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张爱萍再次被冲击，但他拒绝做任何检讨，因为他已认定，错的是党，不是自己！在粟裕、宋时轮等老战友的关心帮助下，有人主动替他写了检查，陈锡联觉得很好，请他签字，张爱萍死活就是不签。不过，张爱萍仍对陈锡联心存感激。（391页）

张爱萍因心脏病突发住进医院，受到叶帅的打招呼保护。1976年1月18日，经中央批准，国防科委和七机部七千多人联合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批判张爱萍的大会。这时的批判大会毕竟比文革初期“文明”了不少，张爱萍可以站着面对麦克风发言。七千大众都想听听他的“检讨”，哪知张爱萍只对着稿子念了七十二

个字（在场的听众一百个人才摊上一个字）：“去年三月我重新工作以来，到了一些单位，接触了一部分干部群众，讲了一些话，也做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将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396页）此时，已经没人敢把他重新送进监狱，还怕什么？顶多去山里开照相馆！

为什么老干部们怕？为什么一有风吹草动就自污，就检讨？理由冠冕堂皇，什么“顾全大局”呀，什么“服从组织”呀，什么“严于律己”呀，什么“无则加勉”呀，其实就是怕摘掉那顶乌纱帽！他们的职业说起来是革命，具体化却是做官，做官是他们“革命有功”的标志，“路线正确”的标志，做官成就了他们，也束缚了他们，扭曲了他们。

张爱萍，有种！

我知道，文革的历史是复杂的，党内的政治斗争和派别矛盾更为复杂。张胜写张爱萍，是儿子写父亲，有特殊的角度和既定的立场，应当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另有话说，这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作为读者，我倒是希望有人把不同的看法和不为人知的事实也写出来。但我对《从战争中走来》持肯定态度，对张老将军怀有敬意。

张胜的这部著作，立了一个新的尺度标杆。比如他在书的后半部多次提到“国务院赵紫阳总理”与张爱萍的互动和矛盾。据我所知，虽然张爱萍对赵紫阳在军事工业和国防科研领域的一些主张持反对和怀疑态度，但在上个世纪的某一关键时刻，他却是签名上书中央军委的七位开国上将之一。当然，张胜没有把这个情节写到书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如此，正面称呼赵紫阳全名和职务，除此书之外，在国内出版物中仅还有《刘华清回忆录》。但不知张胜这本书的出版是不是一个临时尺度？或者只是特例？

【风云人物】

读《陈锡联回忆录》

张光渝

按：本篇原载《读书鉴史：解读周恩来》一书。

一个将才的产生需要很多因素的集合，比如时代，比如处境，比如机遇，比如运气，比如勇敢，比如智谋，比如忠诚等等。在星汉灿烂的中共战将系列中，陈锡联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回忆录丛书》中，《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也是比较耐读的一本。

说到时代和机遇，陈锡联的少年时期都赶上了。1927年，只有12岁的湖北

农村娃子陈锡联就给李先念带路闯进反动保长的家中，后来当上中国国家元首的李先念处决了那个参与镇压革命的恶霸保长。（《陈锡联回忆录》第 10 页）1931 年，在四方面军当通讯班长的 16 岁的陈锡联在“肃反”中因为与老乡吃饭被打成“吃喝委员会”成员，红四军军长徐向前正好视察陈锡联所在部队，喝令制止了对陈锡联等人的迫害。否则，陈锡联就被杀掉了。所以陈一直说徐老总救了他一条命。（第 30 页）

陈锡联数次身负重伤，数次身患重病，在缺医少药战事紧张的环境中，回回大难不死，说机遇也好，说运气也好，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才能当将军。陈锡联就这样一步步成长为新中国的开国上将。

1936 年年底，四方面军的大部分人马在到达陕北后又被派去渡河西征，结果全军覆没，战死者包括曾是陈锡联老班长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陈锡联的老上级李先念、徐向前都是从西路军捡了条命才回到延安的。但同是四方面军的陈锡联所在部队却侥幸没有列入西征军——当时陈是第四军第十师师长，派往黄河以西的是五军、九军、三十军。人的命运是无法预知的。（第 60 页）

长征途中，红四军随张国焘转头南下，途中军部遭敌袭击，军长许世友的卫队被打散，陈锡联端起一挺机枪向敌人扫射，掩护军长脱险，结果背部中弹负伤。陈锡联说：“当时不知道伤口在哪里，只觉得胸腹部肿胀难受。我让警卫员把我头朝下、脚朝上倒提起来，血水马上从伤口处流了出来，肚子感觉轻松了一些。”（第 50 页）这种“外科急救术”肯定会惊倒全世界的医生。

抗日战争开始的 1937 年，刚刚 22 岁的陈锡联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团长，他被派往忻口方向侧击日军，配合国军正面战场。独自带着一个团，陈锡联在山西代县附近发现了日军一个机场，他独立决策，独立指挥，一举干掉阳明堡机场全部二十四架日军轰炸机，解除了忻口战场的空中威胁。国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忻口战役总指挥卫立煌致电周恩来，称烧掉敌人二十四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第 70—78 页）

老将军用了百分之八十的篇幅写他的光荣征战。惭愧的是，作为后辈的我却对他战场以外的东西更感兴趣。

性格决定命运。陈锡联是一个忠厚谨慎的人。这一特点对他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陈锡联讲了两个故事。抗日时期在延安，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准备开“七大”，陈锡联和陈赓都参加了修建延安机场的劳动。他们两人推一辆独轮车，陈赓建议上工时自己推着陈锡联，下工时陈锡联推陈赓，陈锡联说：“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刚干了几天我就大呼上当。”因为下工时劳累，谁推车谁费劲。陈锡联要把顺序换过来，陈赓不干，最后以一人推一天“成交”。（第 145 页）

陈锡联拉着陈赓去见朱总司令。陈赓要陈锡联去叫门，他自己用木棍和土块打朱总院中树上的果子。二陈从总司令房中告辞出来时，陈赓指着地面说：“老总啊，树上掉了好多果子！”老总宽厚，说，既然掉下来了，你们就拿去吃罢。这种事，陈锡联无论如何干不出来。（第 144 页）

当然，忠厚谨慎本不是为了占这些小便宜。1970 年庐山会议上，陈锡联的谨慎起了大作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林彪发表了维护“天才”的讲话，掀起轩然大波。陈锡联主持东北组，看到其他小组纷纷表态拥护设立国家主席，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东北组的同志也要求出简报，跟上形势。陈锡联却说：“你们个人要表态，这是中央委员的权利；但是我们东北组在简报上不能表态，因为中央没有要求我们表态。”他还指示秘书，东北小组的简报要经过他的签字才能上报。最终，陈锡联得以在那种非常复杂的形势下全身而退。（第 366—367 页）

当然，在中共愈演愈烈的“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文革那样敌我不分是非不分的乱世之中，光凭谨慎忠厚是不解决问题的。应当说，毛泽东在 1976 年初要陈锡联代替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成为军队实际上的第一主管，是看到了陈锡联 1970 年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同时也不能不说有毛远新的因素——当时毛远新是唯一能随时见主席的“联络员”，他的“小报告”导致了邓小平的再次倒台。推出陈锡联，至少毛远新没有说反面的意见。在 1975 年秋调到北京之前，毛远新是实际上的东北第一交椅。陈在辽宁工作期间与“小毛”的关系处得很好，这是事实。在陈锡联的整篇回忆录中，我们看不到他曾经与谁有过对立或激烈冲突。

微妙的是，陈锡联承认自己文革期间在“在辽宁及东北地区的‘三支两军’和地方工作中，曾经犯了严重错误。为此在 1980 年 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我辞去了所担任的领导职务，并诚恳地做了检讨，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认真地吸取教训。我多次说过，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教训。”（第 395 页）

但是，陈锡联的“严重错误”和“最大的教训”究竟是什么，回忆录中一字未提。那个对他主政东北影响和牵制最大的毛远新，他也一字未提。把错误全揽在自己身上，不符合实际；推给毛泽东的大侄子，又说不过去。陈的为难可以想象，也可以理解。文革中的陈锡联，可以单写一本书。

如果我们把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的陈锡联与对小青年毛远新毕恭毕敬的陈锡联连在一起；如果我们把指挥奇袭阳明堡的陈锡联与被群众讥讽为“陈三两”的陈锡联连在一起，会感到遗憾和无奈。时势造英雄，时势也能颠覆英雄，无论是忠厚谨慎还是机智潇洒都不能改变这一规律。我们很难想象陈赓活到文革会是怎样的境遇。

但是，陈锡联毕竟是一位明智的将领。他受命主持军委工作，并没有忘乎

所以，而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忠厚和谨慎仍然在发挥正面的作用。陈锡联说：“在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经常向叶帅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叶帅也经常过问军委的事情，支持我的工作。”（第 384 页）

1976 年 10 月 5 日，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的前一天。那一天，陈锡联在唐山地震救灾现场视察、慰问，“就在当天下午三时许，华国锋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我赶快回京，说《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情况非常紧急，要我马上回去商量事情。”陈锡联意识到局势严重紧迫，没顾得等其他同行人员，就在三点四十五分登机回京。陈锡联从自己家里拿到《光明日报》，匆匆赶往华国锋处。华明确告诉他明天要动手对付“四人帮”，还做了一个抓的手势。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与陈锡联“曾经几次”谈过解决“四人帮”的事情，陈锡联都表示坚决支持。（第 389—390 页）看来事先就知道要搞掉“四人帮”的远不止以前所说的那少数几个人。

华国锋对陈锡联说：“你先回去，吴德，吴忠他们还要找你。”也就是说，二吴也是事先就知道的。陈锡联说：“按照规定，动部队必须经军委批准。吴德、吴忠他们先后来到我家，我当面授权他们可视情采取行动，不必逐级请示。”（第 390 页）

当天晚上，和陈锡联住得很近的华国锋步行到陈锡联家，又谈了第二天的详细部署，华要求陈锡联不要出去，在家等消息。10 月 6 日晚，华国锋的电话来了，“事情解决了。”陈锡联当即赶往玉泉山。（第 390—391 页）看来，陈锡联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在那个关键时刻起的是一个开绿灯的作用。华国锋和叶帅调动部队，还要经过陈锡联。

文革结束了，文革的错误要清算和纠正，个人有个人的账。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邀陈锡联夫妇到家里去，卓琳和王璇梅另到一室聊天，两个男人谈正事。邓对陈说：“你在北京不欠账，你的问题主要在东北，群众对你有意见，你做个深刻检讨”，“有错误不要紧，改正就是了。”（第 402 页）

许多人对陈锡联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的事情有看法，认为他在叶帅“养病”的问题上起了不好的作用。陈锡联对此表示理解，并作了说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在回忆录中说：“记得有一次我在三零一住院，粟裕同志也在住院，他来看我。对我说：原来不了解情况，现在搞清楚了，根本没有那回事。小平同志在找我谈话时也说，我是了解你的，你是没有野心的。”（第 384—385 页）

辞了职的陈锡联后来被选为中顾委常委，应当是中央对他的肯定和信任。

当事人写回忆录，都会有取舍，我们不仅能从“取”中获得信息，也能从“舍”中领会端倪。陈锡联写了他参加“七大”的情景，但对于自己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八大”和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九大”、“十大”却避而不谈。陈锡

联讲了 1970 年的庐山会议，但对于 1959 年的庐山会议却避而不谈。不过，陈锡联能够涉及文革，能够谈及自己的错误（虽然没有具体化），已经很不容易。反观《杨成武回忆录》，洋洋千页，竟然到抗美援朝结束就谢幕，总让人觉得应当有下册才对。还有《秦基伟回忆录》，结尾在 1973 年到成都军区上任司令员。一般人写回忆录，或是结到建国，或是结到文革前或文革后，很少见结到文革之中的。相比之下，我们对陈老将军也就不必苛求了。

【风云人物】

复生不易——潘复生

张光渝

按：本篇原载《告别元老》一书。

我父亲的老战友潘复生是山东人，早年以济南乡村师范学生的身份搞党的地下工作，1932 年被捕。1937 年 10 月，国共合作，韩复榘释放政治犯，潘复生出狱，奔向抗日战场。1945 年我父亲从区党委书记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七纵政委，军区司令员杨勇任七纵司令员。同时，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也进行改组，张玺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王秉璋任军区司令员，赵健民任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潘复生任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致远任军区副司令员，潘炎任参谋长，王幼平任政治部主任。

这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冀鲁豫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员的名单。

1956 年八大，张玺、赵健民、潘复生和我父亲都成为七十三名中央候补委员之一。

1949 年 8 月，潘复生任新成立的平原省委书记，平原省省会是新乡市。与此同时，冀鲁豫革命根据地也完成了自己十二年的光荣历史使命。1950 年初，由于组织不当，濮阳发生了冻死民工和马匹的“濮阳运粮事件”。当时执行纪律很严格，潘复生负领导责任被降为省委副书记。不过这是一个小挫折，1952 年张玺从河南调到新成立的国家计委，潘复生接替张玺任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是河南省省长，这个省长很有能量。

1957 年，在潘复生的主持下，河南省委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提纲》。河南是农业大省，当时提出用奖励的方法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是大胆的，也是深受群众欢迎的。但这个政策与当时的大环境不符，当时政治上在反右派，经济上在酝酿大跃进。省长吴芝圃带头反击，说那个宣传提纲是“右倾情绪”、“保守主义”，省委第二把手显然是在中央的支

持下展开了全省范围批判省委第一把手的运动。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把潘复生与文艺界的丁玲（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当时被打成“右派分子”和“丁陈反党集团”头子）、广东的古大存（曾任广东省副省长，1958年被撤职）、广西的陈再励（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1958年被撤职）并提，同时也谈到“潘复生犯了错误，但要允许他改正。”

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于1958年5月，那是大跃进正式开始的标志。吴芝圃反右有功，总书记邓小平对吴芝圃表示：“真理在你们这一边。”会后，潘复生被解职，下放到农场，吴芝圃“扶正”任省委第一书记，一手导演了河南的“大跃进”闹剧。

吴芝圃催生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嵒岈山人民公社；吴芝圃提出了连毛泽东都不太敢完全相信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计划；吴芝圃主导了全省范围的反右倾政治运动，干部群众因为不同意高指标高征收而被打死打伤逮捕关押的有数万人之多；从公社到县市的各级干部、群众被打成“小潘复生”的达二十万人；在三年灾荒最严重的时候，吴芝圃仍然虚报粮食产量，把河南粮产二百四十亿斤高报为四百亿斤，在上百万人饿死的情况下竟继续掩盖真相，欺骗中央，酿成震惊党内的“信阳事件”。最后，这个“大跃进先锋”终于使毛泽东也忍无可忍，于1962年被撤职，调任中南局“文教书记”了事。吴芝圃在给党中央和中南局写的检讨中承认，因他的错误导致的信阳事件“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地步”，“欠五千万河南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上了年纪的河南人提起吴芝圃，无不摇头。

与此同时，1962年4月，中央批准为潘复生平反。显然，“改正”错误的不是潘复生，而应当是大跃进的发起者。潘复生的新岗位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社长，可以说这个职务差不多算个“闲差”，但对潘复生意义重大，它宣布了潘复生政治上的“复生”。潘复生从河南进京，成了京官。我猜测我父亲应当为潘复生“接过风”。那时正值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的长子没有考上大学，万里欲送子出京锻炼，潘复生就向老战友推荐了自己下放的那个位于西华县黄河滩上的农场。“万老大”在那里当了十几年农工。

1966年1月，潘复生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他又成了执掌实权的“封疆大吏”。不过，要是历史能够推倒重来，我想潘复生宁可选择在那个“社长”闲差上干到离休。1966年9月到12月，我父亲到黑龙江疗养了三个月，潘复生在那样复杂的条件下对他关照有加，很不容易，也很仗义。

作家梁晓声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了《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讲述他少年时代在黑龙江经历文革的往事。我不评论他的作品如何，但他把文革初期的潘复生说成“正在养病”的“副省长”，说造反派把潘复生拉出来充当“革命领导干部”，好

像辛亥革命起义军把黎元洪从床底下拖出来当起义领袖一样，那是完全说错了，梁晓声当年岁数太小了。事实上，1967年1月16日，在潘复生的支持下，黑龙江省的二十三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成立联合总部，发表《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公告》。潘复生当时以最早支持红卫兵造反的省委第一书记而闻名全国。

这才是当年潘复生的地位和名气。《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贺黑龙江“革命政权”的诞生，标题是《东北的新曙光》，与该报为贵州夺权发的社论《西南的春雷》遥相呼应，一时轰动全国。想当年，以省委第一书记身份担任“夺权”后的首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潘复生是第一人，后来还有河南的刘建勋和广西的韦国清。潘复生能够占此鳌头，客观上可能是因为他1966年刚刚上任，与黑龙江省委以前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没有牵连，他容易表态，造反团体容易接纳。不过，文革后还能站得住脚并且继续高升的，唯韦国清一人而已。

1967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导的夺权大潮席卷全国，真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月31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潘复生出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当时尚未被打倒的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也要从沈阳赶到哈尔滨出席成立大会，表示祝贺。

革命委员会当然要“革命”，革命就要有对象，黑龙江的头号“革命对象”是潘复生的前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欧阳钦的独子欧阳湘不承认自己的父亲是“三反分子”，于1968年11月以“洪新建”的化名给省革委会写信，为欧阳钦辩护，反对将欧阳钦打成反党分子。在潘复生的批示下，“洪新建”很快被捕，当年《黑龙江日报》在通栏标题下报道逮捕欧阳湘的群众宣判大会：

极力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喊冤叫屈、招魂翻案，署名“洪新建”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的，就是我省党内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欧阳钦的儿子欧阳湘。（《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反革命》《黑龙江日报》1968年12月1日报道）

被捕后的欧阳湘很快被逼供迫害致死，年仅二十八岁。

潘复生曾被自己的搭档吴芝圃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可平反不到几年，自己竟又给前任第一书记欧阳钦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还整死了这位老同志唯一的儿子。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地你上我下，确实可以联系到个人责任、个人品德问题，但相似的悲剧反复上演，又决不能简单归结于个人因素，而是要放到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发生偏差、错位的大背景中

看。

正因为这种偏差和错位，潘复生的“革命”姿态并未保住自己，到1970年7月就“栽”了，周恩来宣布：

黑龙江问题的根子在潘复生那里。

1971年6月，潘复生被正式免职，其实他已离开工作岗位近一年了。他栽倒的原因有好多，包括因为他历史上的被捕而被怀疑为“叛徒”，但绝不是因为他参与打倒了欧阳钦，更不是因为欧阳湘之死。欧阳湘是到了1978年才在胡耀邦的亲自督促下得到平反的。也就是说，潘复生当时在黑龙江被打倒的原因，恰恰不是我们今天认为他所犯的那些错误。这就是历史的偏差和错位。

文化大革命是所有领导干部躲不过去的一道“坎”，你想用正常思维方式，听党的话，支持群众运动就能不犯错误吗？不可能。无论是谁，要么在运动初期被打倒，要么在运动中期被批判，要么在运动后期被审查。我父亲那时就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与我母亲相约：

活着就是胜利。

这番话适用于张霖之，也适用于潘复生，适用于除极个别人外的所有地方领导干部。我爸爸回京前在与潘复生告别时又说：

打死我可以，说我反党是不行的。

这句话是“活着就是胜利”的补充，那是爸爸为自己划定的底线——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违心承认自己反党。与此同时，他还和我妈妈共同做出“决不自杀”的承诺。潘复生认为霖之同志的话言重了，当时他还没有考虑到自己如果再一次倒下，还能不能“复生”。

两位老战友哈尔滨一别，我父亲成了革命“对象”，潘复生成了革命“动力”，几十年后回头看去，他们却都是文革那场闹剧的牺牲品。

潘复生没有能够在政治上再次复生。他被整整审查了九年，1980年，潘复生抑郁而终。他是极少数未能从打倒“四人帮”的历史转折中得到利益的冀鲁豫地区的领导干部。现在看来，文革运动初期倒而不死，是最佳选择。但这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尺度，自己能做自己多少主呢？

潘复生死后两年，中共中央于1982年4月批准黑龙江省委对他的审查结论：

历史问题已经查清，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不做组织处理。

这能算“复生”吗？

半个世纪前干革命被捕，在狱中英勇斗争，半个世纪过去死后两年才审定为“没有问题”，情何以堪？

历史上，党内把被捕问题当作一根棍子，根据形势和政治需要，可以随时举起来，也可以随意打下去，用以制衡约束干部，这是一个很坏的传统。刘少奇就不需说了，1970年陈伯达因为卷入“林彪集团夺权阴谋”而被审查，毛泽东马上亲自宣布这位中央第四号人物是“叛徒”、“特务分子”，但显然没有任何根据。粉碎“四人帮”后，正式下发的“四人帮”“罪证材料”中又说江青“自首叛变”，后来才澄清那又是一个随政治潮流而动的假证。我妈妈在文革中对我们讲过一段话：

中国这样对待被捕的同志影响很坏。那些亚非拉闹革命的人看到被捕出狱后要受这样的歧视，谁还愿意干革命？

这话说得具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水平。

1979年中央举行八人联合追悼会，中南局书记吴芝圃的遗像和我爸爸的遗像挂在一起，接受众人的鞠躬致意。正被审查的潘复生肯定在报纸上看到了这则消息，面对张霖之和吴芝圃放在一起的一场追悼会，潘复生是怎样一种感觉？潘复生去世时没有“结论”，也就没有登报发讣告。吴芝圃的追悼会开得，潘复生的讣告发不得。

一般地说，黑龙江的干部对潘复生的评价是负面的，说他“极左”，“老干部整老干部”。但到了河南又不同，河南人民对潘复生在大跃进期间挨吴芝圃的整抱有同情之心。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治河六十年》中就有一节题为“怀念好领导潘复生同志”，河南没有忘记这位老书记。

新中国建国以来潘复生沉浮起落的经历，是中共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国家民主制度缺失的典型事例。

1968年，潘复生从黑龙江来北京开会，我陪着妈妈到京西宾馆去看他。那时的潘复生看起来是一个很结实的中年人，其实已经年过六十了。妈妈见到潘复生，想起自己和丈夫在东北度过的最后时光，不禁放声大哭起来。潘复生在一旁低声劝慰，并重复着霖之同志临别时给他的留言。那是我永远难忘的情景。

本文参考、摘录的书目和文字资料：

《吴芝圃和河南大跃进运动》 徐明

《父亲送我去下乡》 万伯翱口述历史演播稿 2006年5月13日凤凰卫视播出

《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梁晓声

《目击迫害欧阳湘》 李振盛

《北方大厦广场见证历史沧桑》 李振盛

《治河六十年》 袁隆著 黄河水利出版社

【风云人物】

戚本禹的“开会即民主”论

张光渝

按：本篇原载《告别元老》一书。

1966年12月2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来到北京矿业学院，在学生饭堂发表公开讲话，他说：

你们炮打张霖之的行动是革命行动。煤炭部的对面就是北京饭店，你们给煤炭部写的大字报刷的大标语把煤炭部变成了大字报大标语，对面的外国人都看见了，揪斗张霖之震动了世界！

面对热血沸腾的“革命小将”，戚本禹进一步煽风点火：

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你们的炮火还不够猛烈，要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要冲向社会，冲向煤炭部，要把主要斗争方向对准煤炭部甚至比煤炭部更高的，要狠狠地斗！不要死材料要活材料！

学生代表问“首长”，有没有张霖之是彭真死党的“罪行材料”，戚本禹答：

材料你们自己找！

1966年12月14日江青公开点了我父亲的名，首先诬陷他是“彭真死党”。我父亲于12月19日主动前往矿业学院，听取群众批评，检查“错误”，接受批

判。最初的几天，我父亲虽然没有行动自由，但并未遭到虐待，扣押他的造反派要进一步探试风向，如何“处理”这个“自投罗网”的意外“战利品”，他们还要思量思量。张霖之毕竟仍是一部之长，谁来捅破那最后一层窗户纸？此时，戚本禹来了。

正是由于戚本禹 12 月 24 日的那番煽动性讲话，我父亲的境遇急转直下，造反派学生们执行戚本禹“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的指令，联合部机关和部属单位以及各地煤矿的造反派，开始了对我父亲惨无人道的拷打折磨，逼供“活材料”。中央文革驻煤炭部的“联络员”还把批斗照片交上去，要江青、戚本禹看看煤炭系统“集中”了的“火力”。江青、戚本禹是迫害我父亲致死的元凶。

戚本禹到矿院点名诬陷我父亲的第三天，应邀参加了毛泽东举行的小型生日宴会。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回忆：

（19）66 年 12 月 26 日，主席过生日，本来是历来不请客的，这次请了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没有林彪和总理，也没有康生。

王力认为，主席不请康生是因为当时对康生还不太满意。

过生日这天，主席的话很多，最重要的都在六七年《红旗》元旦社论上。主席站起来祝酒：“为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干杯”。

“老人家”为全国上下的“大乱”欢欣鼓舞，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根基，发动革命造反群众打倒“走资派”，建立新政权。王力坚持说，毛泽东是为“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祝酒，不是为“全面内战”祝酒。我相信他的话。1966 年年底，“全面内战”还没有成型，那是 1967 年到 1968 年的事。

受到鼓舞和激励的戚本禹第二天（12 月 27 日）就和关锋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召见煤炭部造反派，继续给他们提供炮打张霖之的“线索”，这显然是“全面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

张霖之和邓小平都是从西南一起来的，他们是一伙。张霖之不仅是彭真黑线上的，而且是邓小平黑线上的人物，你们还要从邓小平这条黑线上查一查。

我父亲死后，戚本禹“分工”管煤炭部。王力回忆，1967 年 2 月 18 日凌晨毛泽东为“二月逆流”事件定性的同时，做出了抓军队、抓地方、抓干部、抓铁

路和煤炭的“四个抓”指示：

江青根据主席“四个抓”的指示，夺了几个权。她在文革小组会议上说要戚本禹抓煤炭和铁路……他还真抓了，他从空军调几员大将，派去管铁路，然后又叫他管煤炭。总理反对，在文革小组会议上说：部队的同志不能抓煤炭，煤炭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张春桥听了马上说：“他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好，支左支得好，为什么就不能搞煤炭？”后来不知是不是这个人管煤炭了。

被派去“管煤炭”的空军“军代表”名叫王素，后来戚本禹倒台了，他也就离开了。

1967年到1968年，真正的“全面内战”爆发了，除了飞机导弹没用上，什么武器都派上阵。毛泽东“气势恢弘”地表示，十几年没打仗，这对群众也是一个锻炼，并明确做出了“武装革命左派”的指示。可是一旦这个“锻炼”针对了自身，问题就不同了，1967年7月武汉“七二〇”事件，8月份北京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使得毛泽东改变了主意，他于1967年8月底“端出”了王力、关锋，又终于在1968年1月14日“端出”了戚本禹。

毛泽东把戚本禹和王力、关锋“区别”了几个月，是因为戚本禹和毛泽东的关系比王、关更深一些。王力、关锋的资历要老于戚本禹，但这些资历在“改朝换代”的当口往往成为负面因素。比如，王力就被认作“邓小平的人”，而关锋则是“邓力群的人”。

名字被排在戚本禹之前的关锋对“王、关、戚”这种排列法却并不赞成。他说：

“王、关、戚”实际上应该是“戚、王、关”。

因为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他一直在中办工作，最接近毛泽东和江青，地位特殊，在文革高潮中最为活跃。因为戚本禹行为恶劣罪孽严重，所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央重新审理“王、关、戚”一案时，对王力和关锋没有判刑，而对戚本禹却判了十八年有期徒刑。

曾在文革初期当过一段文革小组成员的穆欣也说：

在这个小组（注：指中央文革小组）里，好多事情都不成体统。例如最得江青宠信的小组成员戚本禹，上窜下跳，全无章法。江青要整什么人，到田家英处抄家，诬陷邓拓为“叛徒”，在报刊上批判刘少奇，在群众中散布“刘邓是党内

最大的走资派”，煽动中央办公厅造反派在中南海围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并去抄家，带领造反派在中南海门外安营扎寨“揪刘少奇”，在外交部门口聚众寻衅揪斗陈毅，都叫戚本禹去打头阵。江青在小组里要整什么人，也是戚本禹先放炮。他为江青立了“功”。

为文革和江青立了功的戚本禹，1931年生，是中央文革最年轻的成员，但他赶上了好潮流，1949年十八岁高中毕业时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在那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戚本禹被选入中南海，那是许多老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都没进去过的地方。戚本禹聪明勤奋，写文章很好，组织上把他送到中央团校深造，又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中，选为自己的助手，后来又推荐他任中央信访办公室的科长。他的命运直接与毛泽东挂钩是在1958年。信访办的八个年轻人给领导提意见，说他们领导反右整风不力，结果被打成“反党集团”，其中就有戚本禹。谁给上级提意见，谁就是反党，这是自1957年夏季反右运动开始以来的正常思维定式，但这回却碰壁了。毛泽东知道中央办公厅也出了反党集团，很不高兴：

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

中南海的这八个青年干部被毛泽东比作唐肃宗时主张改革变法而遭受打击的“八司马”。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什么时候提意见算是革命，什么时候提意见算是反革命，没人弄得清楚，完全凭运气。戚本禹的运气要更好一些。1962年，戚本禹又因为给领导提意见挨了整。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偶然遇上了戚本禹，戚本禹向毛泽东直言了自己受到的冤枉。毛泽东一听“戚本禹”三个字，便记起了他是卷进“八司马事件”的人。毛泽东责令田家英查问，再次解救了戚本禹。

年仅三十一岁，就受到“伟大领袖”的两次眷顾，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同寻常的经历，不能不对戚本禹以后的人生路程产生特别的影响。戚本禹开始钻研历史，开始学着用毛主席“古为今用”的思维方式研究历史事件。1963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评李秀成自述》，一炮打响，毛泽东在阵阵责难声中支持戚本禹的观点，这是戚本禹人生的真正转折点。

无论戚本禹在《评李秀成自述》一文中把李秀成定为叛徒是否有道理，我们

尚不能说此时的戚本禹有何罪责。但是，戚本禹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架可以带他到更高地位的天梯。抱负和野心有时是很难分辨的。如果戚本禹后来遇到的环境是学术争论笔墨官司，他可能会是另一种表现，但情况相反，他抓到的那架梯子通向一场政治动乱。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我父亲也绝对想不到自己的命运与戚本禹有任何关系。

1965年11月姚文元在上海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天子身边”的戚本禹敏锐地察觉了风向，在1965年12月推出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用扣政治帽子的手段攻击历史学家翦伯赞，与姚文元南北呼应，拉开了文革的序幕。毛泽东说：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

此时的戚本禹把自己捆上了“文革战车”，一往无前地狂奔而去。他接替了对他一贯提携帮助的田家英的工作，傲慢地要田家英到他那里去交割文件；他参加了1966年“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他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与关锋早在1966年6月就致信中央，要求对在西南工作的彭德怀采取措施；他亲自策划了1967年数万群众围困中南海揪斗刘少奇；他亲自指挥对刘少奇夫妇、邓小平夫妇、陶铸夫妇的面对面批斗；他鼓动中南海里的造反组织冲击朱德元帅驻地，要朱德“滚出中南海”；他组织了1966年12月造反派们把彭德怀元帅从四川押解回京批斗的行动。

戚本禹忘乎所以，搞得天怒人怨，终于沦为1967年全国大乱政治局面的“替罪羊”，他是一只被主人放出来咬人的狗，应该说“替罪犬”更贴切一些。王力、关锋倒台后，惶惶不可终日的戚本禹采取了“自救”动作。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王力、关锋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接着又自我检讨：

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戚本禹指望毛泽东第三次拯救他。但是事过境迁，他不再是一个小小的科长办事员，他是影响文革大局的一粒棋子，根据政治需要必须拿出棋盘。问题在于，以前的两次伸冤，戚本禹还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整，这一次，他却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

毛泽东看了戚本禹的这封信后，于9月7日在这封信上写下了批语：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但后来的一切，又都不是戚本禹自己能左右的。相当多的被毛泽东宽慰“改了就好”的人，下场都很惨，包括刘少奇在内。当不断寻找造反对象以便“立新功”的造反派们知道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都不满意时，就立即把矛头指向了尚未被“揪出”的戚本禹。1967年12月，北京街头出现了一批大标语：“戚本禹算老几！”“戚本禹是‘中央首长’吗？”“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各式各样的红卫兵小报对王、关批够了，开始集中火力批戚本禹了。

自作自受，玩火自焚，1968年1月，戚本禹被直接关进了秦城监狱。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在认定的诬告陷害罪中，有诬陷迫害煤炭部长张霖之致死的罪行。

因为戚本禹1968年就开始坐牢，所以1983年判处十八年有期徒刑时他应当是满意的，他至少知道还有三年就可以出狱了。戚本禹1986年出狱，在上海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叶永烈曾去采访他：

戚本禹还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大大咧咧。他接受采访时，神态自若，头发乌黑，很随便地蓬松着。他肥瘦适中，身体不错，谈话时无拘无束。戚本禹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各种书报他都看，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但他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

明史是很有意思的历史。文革“号角”就是从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吹响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铁血治贪，同时对功臣名将捕风捉影，大开杀戒，满门抄斩，冤案弥天，不知为什么众多“过来人”都喜欢明史。戚本禹从朱元璋那里得到的是启发还是教训？是赞叹还是遗憾？

戚本禹以前在中南海的同事李志绥跑到国外，用“毛泽东私人医生”的名义写了一本书，影响很大。我看过那本书，很明显是以真带假以假充真之作，没有什么史料价值。戚本禹也看了那本书，并就此对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谈了他自己的看法。所有在中南海工作过的人都看得出那本书的虚假，戚本禹怒斥李志绥，维护毛泽东，这不奇怪，但他对毛泽东“专制”方面的辩解却让人觉得可笑。戚本禹反驳李志绥关于毛泽东“专制独裁”的说法，他说：

除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时期，这个政府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经过法定的会议讨论通过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政权瘫痪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仍然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法定的会议讨论决定。既然是通过了合法的形式，你并不能说它是专制独裁！虽然，那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威望，许多决定是按照他意旨通过的，但既然通过了一定的法定程序，就不能说是个人的专制独裁。你可以对民主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违反规则提出责难，但你不能简单地把它与封建时代的皇帝独断独行等同起来。毛泽东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是没有可指责之处的，但是他仍然是党和国家民主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者和力行者。

按照戚本禹对“民主制度”的解释，只要有“开会”这个形式，就不能说“专制独裁”，所以，毛泽东个人决断打倒刘少奇、鼓动群众造反夺权搞得天下大乱，就不算个人专制，因为这些活动前后都是“开”过各种各样的“会议”的，包括那个一半以上中央委员都无权参加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戚本禹研究过朱元璋，不知这位太祖爷主持的“御前会议”算不算“法定形式”，是不是“民主制度”？以戚本禹的水平，对民主制度的理解不至于低到如此程度。他这样的说法，是立场过于偏颇所致，他仍然向往文革式的“大民主”，由那些经毛泽东指定的人在毛泽东身边“开”一个什么“会”，领得戚本禹所谓的“意旨”后就可以为所欲为。

戚本禹对文革有感情，对毛泽东更有特殊的感情。他说：

我五十年代接触毛泽东，六十年代离开毛泽东。就与他的交往看，我不感到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领导人更缺少民主。就以李志绥讲到的“八司马”案件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即“八司马”）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当时被批判斗争了几个月的“八司马”听了毛泽东这句话，全部嚎啕大哭！

毛泽东维护了这八位青年干部对中央办公厅领导提出批评的民主权力，但戚本禹应当知道，正是在当年那场由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中，多少青年人仅仅因为给处长、科长、支部书记提几条意见就被打成“右派分子”？戚本禹等人给上级提的“意见”，内容恰恰是批评中办领导“反右不力”，有什么自我吹嘘的理由？毛泽东说“八司马”不是反党，他们就不是反党，这里只有偶然性，没有

必然性；不能延伸，不能复制；没有程序规范，没有判定标准，这算什么“民主制度”？由此发展到文革，中央高级干部哪一个是“走资派”，哪一个是“革命派”，全凭毛泽东一句话而已。那些被毛泽东“保”了的，无不千恩万谢，“嚎啕大哭”者也有其人。但是，难道只要有人被毛泽东保护“过关”了，就说明毛泽东在文革中是“党和国家民主制度”的“力行者”？

有人也许认为费如此多篇幅批驳戚本禹的谬论不值得，甚至可能为他做了“宣传”，那就请看互联网上形形色色的文字：

戚本禹是个人物！其本人更是具有大将之风度！时至今日仍把我们伟大的毛主席作为最最崇敬的导师，他的文笔非常厉害，理论水平很高，不愧为毛主席的“御笔”。对您非常之崇拜!!!

崇拜者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还有比较“理性”的赞赏：

（戚本禹）虽然早前曾是极左分子，但他现在对社会转变的适应很好。这些充分说明人是会变的，戚本禹本身的命运可悲更多于可恨。可能与田家英相比，戚不是一个宁折不阿的传统知识分子，至少他没有选择田的方式。但人各有志，他能挺过十八年的牢狱之苦，能再站出来写写文章，吐露心声，既没有大骂毛去落井下石，也没有痛哭流涕以求宽恕，我们也可以再一次宽容的接纳他的归来。阅读他的文章，可见其写文章之时逻辑严密，说理充分（虽然这些本领以前被用作发动文革的“文”诛笔伐），同时他也表现出了比较宽阔的胸襟和气度，尤其是对待毛的态度上。但并不说他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他在为毛辩护时，特别是关于毛是否专制独裁的问题上，仍然强加辩驳，有些看法也值得商榷。但是观点不同，可以争辩，他的为人品行，至少在文中流露出来的还是相当正直的。

那就让我们看看有关史料，领教一下戚本禹的“严密逻辑”和“正直人品”。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戚本禹攻击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把刘少奇放在“爱国主义”的对立面大肆污蔑，全国各大报也予以转载。戚本禹第一次不指名地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将刘少奇“点”为“反革命”：

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已没有了人身自由的刘少奇在中南海看到这篇文章后，气愤至极，他把报纸一摔，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戚本禹早年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知道毛泽东1950年批评过电影《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影片。他利用自己查阅资料的便利条件，东拼西凑，无中生有，硬把刘少奇说成《清宫秘史》的“黑后台”，这就是戚本禹“严密的逻辑”和“正直的人品”？借用权力任意地重新诠释历史然后打倒政敌的恶劣行径，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戚本禹是力行先锋之一。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接受黄峥的专访，她说：

（1967年）8月5日（注：这一天是毛泽东公开针对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批判“刘、邓、陶”大会，同时在中南海组织了三四百人批斗少奇和我。批斗会由戚本禹的秘书王道明主持，曹轶欧等都参加了，还拍了电影。这次批斗会是最凶狠的一次，造反派对我们拳打脚踢，人身污辱也更厉害。69岁的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行走困难。

回房后，少奇不顾疲惫，对来人抗议说：“我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我！我是个公民，为什么不许我说话？宪法还在，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国家。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1983年法庭审理戚本禹案，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是其被认定的罪行之一，戚本禹难逃其咎。他至今仍然抱定“文革民主”不放，毫无忏悔之意，这样的人怎么能算“可悲更多于可恨”？这样的人怎么配与田家英相比？如何一句“人各有志”就能搪塞过去？难道蓄意诬陷也算一“志”？

“佩服”戚本禹的人还说：

戚本禹今年73岁了（注：看来此话讲于2004年），当年毛口中的小子也已垂垂老矣，我们为何不能多一点宽容呢？

戚本禹现在安度晚年，过着远高于一般百姓水平的舒适生活，而刘少奇早已在非人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下化为连姓名都不准留下的骨灰。还应当怎样对戚本禹“多一点宽容”？难道还真的要肯定他的“正直”和“胸襟”？

我预言：假如戚本禹可以长寿百岁，那么他很可能被人尊称为“戚老”，因为那时的他不再被看作刑满释放的罪犯，而是一个亲历文革高层事件的“活文物”。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样的“宽容”已经到顶了。但如果因为他的“垂垂老矣”而“宽容”地曲解历史是非，称赞他的所谓“人品”和“胸襟”，生怕在“戚老”面前显得“小气”丢了面子，那就是对千千万万文革受害者的侮辱和诋毁。

我觉得，现在似乎避讳谈论文革往事，好像说多了是给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党“添堵”、“抹黑”。看一看上述崇拜、宽容戚本禹的言论，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诗人邵燕祥在《奴隶的语言和公民的语言》中说：

文革中的姚文元戚本禹之流，对着一些早已预定要为祭品的人们如吴晗、邓拓、陶铸诸公以至国家主席刘少奇破口大骂，又是尽人皆知的事。他们所以如此勇猛恶毒，如此肆无忌惮，也无非因为奉了密旨，或者早就摸清了主子的意向。

这才是戚本禹“之流”们的真实品质和“水平”。现在，他们已经“奉”不到“密旨”了，但他们对当年的言行表示了任何真诚的悔过吗？

穆欣曾经回忆：

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刘志坚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是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在一次会议上，刘志坚反映1966年11月8日军队院校学员冲击国防部大楼的情况时，坐在旁边的小组成员戚本禹竟然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拍着桌子谩骂刘志坚“胡说八道”。刘志坚据理驳斥，说：“我讲的都是事实，你们不信可到现场去调查。”戚本禹继续纠缠，无理取闹，江青不但不制止戚本禹如此粗暴地打断别人发言，反而指责刘志坚，说：你是老家伙，为什么跟年轻人吵！他是我们“中央文革”的造反派，他可以造你的反！由于江青的怂恿，戚本禹越发得意忘形，直至发展到异常狂妄的程度。

后来被“主子”一脚踢开的戚本禹，真的很正直？很可怜？很委屈？很冤枉？请听优哉游哉的戚本禹说什么：

我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就没法做到这一点。

本文参考、摘录的书目和文字资料：

《杨克同志在张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会上的发言》 1978 年 11 月

《王力反思录》 香港北星出版社

《戚本禹沉浮录》 霞飞 《党史博览》 2005 年第 7 期

《剑拔弩张：中央文革小组实录》 穆欣 《纵横》 2006 年第 1 期

《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回忆录》 陆源采访 钟志林整理

《王光美访谈录》 黄峥编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